

《海纳百川·藏书博览》

简装书库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其他我国主要领导人著作

（著作与汇编）

马、恩、列、斯 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2)

原著：马、恩、列、斯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信息中心

第二部分 对若干历史人物的评论

论斯巴达克

他笔下的斯巴达克是整个古代史中最辉煌的人物。一位伟大的统帅（不象加里波第），高尚的品格，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的代表。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2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59页

为什么要进行战争呢？我们知道，大多数战争是为了王朝的利益而进行的，这叫做王朝战争。但有时战争也是为了被压迫者的利益进行的。斯巴达克掀起的战争就是为了保卫被奴役的阶级。在直到今天还存在的殖民压迫的时代，在奴隶制时代等等，也有过这种战争。这种战争是正义的，是不能谴责的。

列宁：《在工业博物馆群众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8月23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61页

全部历史充满了被压迫阶级不断企图推翻压迫的事实。在奴隶制历史上有过长达几十年的奴隶解放战争。顺便说说，现在德国共产党人，即德国唯一真正反对资本主义桎梏的政党，取名为“斯巴达克派”，就是因为斯巴达克是大约两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隶起义中的一位最杰出的英雄。在许多年间，完全建立在奴隶制上的仿佛万能的罗马帝国，经常受到在斯巴达克领导下武装起来、集合起来并组成一支大军的奴隶的大规模起义的震撼和打击。最后，这些奴隶有的惨遭屠杀，有的被俘虏，遭受奴隶主的酷刑。这种国内战争贯穿着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奴隶占有制时代发生的最大一次国内战争。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50—51页

斯巴达克（？—公元前71年），古罗马最大一次奴隶起义的领袖。公元前73年斯巴达克与被十名奴隶一起逃亡，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队伍迅速扩大，不久就占领了南意大利，公元前71年，斯巴达克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编者注

指阿庇安，古罗马杰出的历史学家。——编者注

论路德、闵采尔

近日来，我有一个想法，写一部关于路德的作品——以其活动和著作作为依据，——是非常必要的。首先，无论是揭露新教的神话，还是揭露扬森（他目前在德国享有盛名）领导的天主教反对新教的那种狭隘的斗争，都是非常适时的；同时，从我们的观点说明宗教改革运动是一个何等的资产阶级运动，也确实是的。其次，一方面把卡尔施塔特、再洗礼派和农民战争之前的路德和这一切之后的路德专门作一比较，另一方面把 1848 年以前和以后的资产阶级专门作一比较，详尽地探索路德的这个转变是怎样逐渐发生的，这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可以做到的，甚至无须过多地进行专门的学术研究，而你的《托马斯·莫尔》刚好为此做了准备，此外，斯图加特拥有再好不过的、最丰富的新教方面的图书，可供你使用。

恩格斯：《致考茨基（1892 年 2 月 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8 卷第 260—261 页

德国还在宗教改革时代就曾有人主张实行社会改革。在路德开始鼓吹教会改革、鼓动人民起来反对教会权力以后不久，德国南部和中部的农民就掀起了反对他们的世俗统治者的总起义。路德经常说，他的目的是在学说上和做法上都要恢复基督教的本来面目；农民也希望这样，因此，他们要求不仅在教会生活中，而且在社会生活中，都要恢复基督教的最初做法。他们认为，他们所处的受压迫受奴役的境遇是和圣经学说不相容的，他们天天受着一帮傲慢的男爵和伯爵的压迫和搜刮，这些人把他们当做牲畜看待；连一项保护他们的法律也没有，即使有，也没有人去贯彻执行，这种情况和最早的基督徒的公社原则以及圣经上阐述的基督学说，是截然对立的。因此农民就起来进行反对他们的老爷们的战争，这种战争只能是殊死的战争。他们公认的领袖托马斯·闵采尔传教士发表了一项宣言，其中自然充满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宗教和迷信的谬论，可是，除此之外，也还包括了这样一些原则：按照圣经，任何一个基督徒都没有权利私自占有任何财产；只有财产共有才适合于基督徒的社会；一个善良的基督徒对其他基督徒不得施以任何权力和暴力，不得担任任何政府职务或享有世袭权力；相反地，既然一切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那末在人间也应该是平等的。这些原则只是从圣经和路德本人的著作中得出来的逻辑上的推论；而路德这位改革家并没有打算象人民那样走得那么远；尽管他在反对教会权力的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勇敢，但是他并没有摆脱那个时代的政治偏见和社会偏见；他还象信奉圣经那样，坚信诸侯地主那种践踏人民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此外，由于他需要贵族和信仰新教的诸侯们的庇护，所以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来抨击起义者；这本小册子不仅割断了他同起义者的一切联系，而且还煽动贵族象对付那些反对神律的叛乱者

路德（1483—1546 年），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家，德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资产阶级的前身——市民等级的思想家。路德号召用暴力反对教会权力。但在农民战争爆发后，他却投靠反动势力，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贫民，成了可耻的叛徒。——编者注

闵采尔（约 1490—1525 年），德国农民战争的著名领袖。曾担任过乡村牧师，1520 年起从事革命宣传活动。他主张废除封建制度，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私有财产的完全平等的社会，1525 年闵采尔组织了农民起义，后在战斗中负伤被俘，英勇不屈，壮烈牺牲。——编者注

那样，用最残酷的手段对付他们。他喊道：“象杀狗那样杀他们！”整本书对人民充满了仇恨，而且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就使它永远成为路德这个名字的一个污点。由此可见，他在开始自己一生活动的时候是人民的一分子，但后来却完全投靠人民的压迫者，为他们服务了。经过一场浴血的国内战争以后，起义被镇压下去，农民又回到了原来的奴隶地位。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10月23日和11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4—585页

路德的健壮的农民本性曾使他在活动的最初阶段中以最激烈的口吻大声疾呼：

“如果他们（罗马僧侣）还要继续妄逞狂暴的话，我以为除了国王和诸侯采用暴力，武装自己，付伐这些流毒于全世界的恶汉，并且不用语言而用武器去制止他们的罪行而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和药方去对付他们了。我们既用刀剑惩治盗贼，绞索惩治杀人者，烈火惩治异教，为什么我们不运用百般武器来讨伐这些身为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而又伤风败俗不配为人师表的罗马罪恶城的蛇蝎之群，并且用他们的血来洗我们的手呢？”

但是早期的这种火一般的革命热情没有维持多久。路德放出的闪电引起了燎原之火。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投入运动了。一方面农民和平民把他的反对僧侣的号召和关于基督教的自由的说教看成起义的信号，另一方面较温和的市民和一部分低级贵族参加了他的运动，甚至诸侯们也被卷入了这个潮流。农民和平民相信和他们的一切压迫者算账的日子来到了。市民、贵族和诸侯只想打破僧侣的权力，打破罗马的羁绊，打破天主教等级制度，并没收教产而从中渔利。各种派别形成起来了，并各自找到自己的代表人物。路德不得不在各派中有所抉择，他怎样抉择的呢？这位托庇于萨克森选帝侯保护之下的维登堡名教授，这位一鸣惊人声势煊赫而被一团趋炎附势之徒簇拥着的伟大人物毫不踌躇地抛弃运动中的下层人民，倒向市民、贵族和诸侯一边去了。剿灭罗马的号召销声匿迹了。路德的调子改成和平发展与消极抵抗了（见1520年的《致德意志民族的贵族书》等文件）。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6—407页

路德因为翻译了圣经，于是就给了平民运动一个强有力的武器。路德在圣经译本中使得公元最初几世纪的纯朴基督教和当时已经封建化了的基督教形成鲜明的对照，使得一个不知层次重迭的、人为的封建教阶制度为何物的社会和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农民们利用这个武器来从各方面反对诸侯，贵族，僧侣。于是路德把这个武器掉转过来反对农民，他从圣经中拼凑出真正的赞美诗来歌颂那些由上帝委派的官方，这是敌食专制君主残害的臣仆从来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的。神授君权，忍耐服从，甚至农奴制度都由圣经认可了。不仅农民起义，就是路德本人对僧侣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全部反抗活动都在圣经里被否定了；这样，路德不仅把下层人民的运动，而且连市民阶级的运动也出卖给诸侯了。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10页

可以看出，两个党派首脑人物的性格和行径都恰恰反映出各自党派的态度。路德动摇不定，当运动日益严重时反而害怕，终至投效诸侯。这一切和市民阶级两面摇摆的政治态度完全符合；而闵采尔革命的气魄与果断则在平民和农民的最先进的一派中完全再现出来。所不同者：路德只求道出本阶级大多数人的想法和愿望就已满足，因而轻易地在本阶级内拥有了十分广大的群众基础；而闵采尔却远远超出于民和农民的当时直接的想法和要求，并且建立一个只由当时革命队伍中最精锐分子组成的党，这个党既要站在他的理想这样高的水平之上，又要求有他那样的魄力，那末这个党只可能包罗当时暴动群众中极小的少数。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19页

聚集在市民阶级温和派路德宗教改革旗帜下的是反对派中的有产分子，大量低级贵族，市民阶级，甚至有一部分希望没收僧侣产业以肥己并欲乘机脱离帝国羁绊而扩大独立地位的世俗诸侯。至于农民和平民则团结在革命派中，其要求与理论都由闵采尔最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5—406页

梦想千年王国快要来临的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已经意识到阶级对立的非正义性。在近代史开始的时期，在三百五十年前，托马斯·闵采尔已经向全世界宣布过这一点。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6—197页

这种蛮于的、但是很可以从平民集团的生活状况得到解释的对于以后的历史的预见，最初是出现在德意志，出现在托马斯·闵采尔及其党人里。诚然在塔波尔派里已经存在过一种锡利亚式的财产公有制，但只是作为纯粹军事措施而存在的。直到闵采尔才把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用来表达一个现实的社会集团的要求，直到闵采尔才以一定的明确性把它表达出来；自闵采尔以后，在每一次的民众大骚乱中都出现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直到它渐渐与现代无产阶级运动合流为止。这种情形，正如中世纪自由农民反对封建统治者日益加紧束缚的斗争与农奴和依附农为完全打破封建统治而作的斗争合流一样。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5页

近代哲学曾经在一段时期里不得不掩藏在基督教词令外衣之下，闵采尔宣说上述这些教义也同样是大半掩藏在这些基督教词令之下来进行的。但他那极端异教的基本思想到处都从他的著作里透露出来。可以看出，这件圣经外衣在闵采尔这里远不如在近代某些黑格尔门徒那里那么重要。然而在闵采尔和近代哲学之间却隔着三百年之久。

闵采尔的政治理论是和他的革命的宗教观点紧密相连的；他的政治理论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就如同他的神学远远超出了当时通行的看法一样。正如闵采尔的宗教哲学接近无神论一样，他的政治纲领也接近于共产主义。甚至在二月革命前夕，许多近代共产主义派别拥有的理论武库还不如十六世纪“闵采尔派”的武库那么丰富，闵采尔的纲领，与其说是当时平民要求的总汇，不如说是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这个纲领要求立即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早经预言的千载太平之国；建立天国的途径是恢复教会的本来面目并废除与这种似乎是原始基督教会而实际上是崭新的教会相冲突的一切制度。闵采尔所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没有什么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而已，所有当时政权，只要是不依附和不加入革命的，都应推翻，一切工作一切财产都要共同分配，最完全的平等必须实行。为了不仅在德国意志，而且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来贯彻这一切，须建立一个同盟。诸侯和贵族都须邀来参加；如果他们拒绝，同盟就须在最初的时机用武器去推翻或消灭他们。

闵采尔随即着手组织这个同盟。他的说教越来越带上更激烈、更革命的性质；除了攻击僧侣而外，他还以同样的慷慨激昂情绪来猛轰诸侯，贵族，城市贵族。他以火辣的笔调刻画出当时的压迫并把他想象中的社会共和平等的千载太平之国和当时的压迫对照起来。同时他写的革命小册子一个接一个地发表出去；他向四面八方派出密使，而自己留在阿尔斯特德及其周围地区进行组织同盟的工作。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13—414页

闵采尔的理想越来越明朗化，也越来越果敢，于是他就坚决地和市民阶级宗教改革分道扬镳，从此之后他就同时是直接以政治鼓动家的姿态出现了。

他的神学哲学理论不仅攻击天主教的一切主要论点，而且也一般地攻击基督教的一切主要论点。他在基督教外形之下传布一种泛神论，他的泛神论和近代推理思考方法相当接近，个别地方甚至着了无神论的边际。他既否认圣经是唯一的启示，也否认圣经是无误的启示。照他看来，真正的、生动活泼的启示应是理性。理性是已经存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之中，而且还要继续存在下去的启示。把圣经同理性对立起来，这就是以文字毁灭精神。因为圣经所宣说的圣灵并非吾人身外之物；圣灵根本就是理性。信仰不是别的，只不过是理性在人身中活跃的表现，因此非基督徒一样可以有信仰，通过这种信仰，通过生动活泼的理性，人人可以有神性，人人可以升天堂。因此天堂非在彼岸，天堂须在此生中寻找，信徒的使命就是要把天堂即天国在现世上建立起来。既无所谓来世的天堂，当然亦无所谓来世的地狱或万劫不复的地狱。当然也就除凡人的邪欲邪念而外无所谓魔鬼。基督也曾和我们一样地是人，他只是先知和师表。他的圣餐其实只是简单的回省宴会，在宴会上大家享用的饼和酒部不必加上任何神秘的杜撰。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12—413页

论拉辛、普加乔夫

资本的权力离开暴力和凌辱就无法维持，而这种暴力和凌辱即使在过去也引起了起义。这个纪念碑就是纪念一位起义农民的代表人物的。他为了争取自由，就在这个台上献出了头颅。俄国的革命者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付出了很大的牺牲，牺牲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优秀人物，是争取自由的战士，但他们争取的不是资本所需要的自由，不是经营银行、私人工厂和进行投机的自由。打倒这种自由，我们要的是真正的自由，……

列宁：《在斯杰潘·拉辛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1919年5月2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296页

俄国人民，这些“本能的革命者”，固然曾经举行过无数次零星的农民起义去反对贵族和反对个别官吏，但是，除掉冒名沙皇的人充任人民首领并要夺回王位的场合以外，从来没有反对过沙皇。叶卡特林娜二世时代最后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叶梅连·普加乔夫冒充是她的丈夫彼得三世，说什么他未被妻子杀害，而只是被废黜和关进牢狱，但是他逃出来了。相反，沙皇被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Bog vysok, Car daljok, 即上帝高，沙皇远——这就是他们绝望中的叹气。至于农民大众——特别是从赎买徭役以来——所处的地位，日益迫使他们去同政府和沙皇作斗争，这足确实无疑的事实：……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年5月—1875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27页

路德维希：……你对斯杰潘·拉辛这个人物是否感到兴趣？你对他，对这个“有思想的强盗”抱什么态度？

斯大林：我们布尔什维克对鲍洛特尼柯夫、拉辛、普加乔夫以及其他这样的历史人物向来是感到兴趣的，我们认为这些人的发动是被压迫阶级自发暴动的反映，是农民反对封建压迫的自发起义的反映。对我们说来，研究这种农民起义的最初尝试的历史总是有兴趣的。但是这里当然不能拿他们和布尔什维克做任何比拟。个别的农民起义，即使不象斯杰潘·拉辛的起义那样带有“强盗性”和无组织性，也不能得到任何重大的结果。农民起义只有在和工人起义结合起来并由工人领导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只有以工人阶级为首的联合起义，才能达到目的。

除此以外，在说到拉辛和普加乔夫的时候，决不应该忘记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要知道这就是他们的口号。

由此可见，拿他们和布尔什维克相比拟无论如何是不恰当的。

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9—100页

斯杰潘·拉辛，俄国十七世纪农民起义领袖，——编者注

普加乔夫，叶梅连·伊万诺维奇（1742年左右—1775年），十八世纪俄国农民起义领袖。——编者注

指斯杰潘·拉辛。——编者注

论克伦威尔

十七世纪英国革命完全是 1789 年法国革命的预演。在“长期议会”里，很容易识别出相当于法国制宪会议、立法会议和同民公会的三个阶段。从君主立宪制到民主制、军事专政、复辟以至 juste-milieu[中庸]革命这个转变过程，在英国革命里面也鲜明地反映了出来。克伦威尔兼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于一身；长老会派相当于吉伦特派，独立派相当于山岳派，平等派相当于阿贝尔派和巴贝夫派。

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1844 年 2 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660 页

斯大林：共产党人是从丰富的历史经验出发的，这个历史经验教导我们，已经衰亡的阶级不会自愿地退出历史舞台。请你回忆一下十七世纪的英国历史。难道不是有很多人说过旧社会制度已经腐朽了吗？然而难道不需要克伦威尔用暴力去粉碎旧制度吗？

威尔斯：克伦威尔是依靠宪法和代表立宪制度而行动的。

斯大林：为了宪法他采用了暴力，处决了国王，解散了国会，逮捕了一些人，斩杀了另一些人！

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
（1934 年 7 月 23 日）。《斯大林文选》第 12 页

在英国内战中出现了两名优秀的骑兵指挥官，一个是保皇派阵营中的鲁珀特亲王，他以每一骑兵指挥官所特有的“骁勇”著称，但他几乎总是冲锋陷阵，忘掉了对骑兵的指挥，他本人如此全神贯注于眼前发生的事，以致在他身上“勇敢的龙骑兵”的表现常多于指挥才能的发挥。还有一个是属于另一个阵营的克伦威尔。他在必要时表现出同样的骁勇，同时在指挥方面却高明得多；他把军队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经常留有预备队以防意外和用于决定性的机动，同时他善于随机应变，因此一般总是战胜用兵轻率的对手。他只靠骑兵就赢得了马尔斯顿穆尔和诺伊兹比会战的胜利。

恩格斯：《骑兵》（1858 年 3—6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4 卷第 308 页

克伦威尔，奥利弗（1599—1658 年），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1649 年起为爱尔兰军总司令和爱尔兰总督，1653 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编者注

论威廉·科贝特

威廉·科贝特当年是英国旧激进主义的最有才干的代表，更确切点说，是它的创始人，他曾经第一个揭露了托利党和辉格党之间传统的党派斗争的秘密，撕下了寄生性的辉格党寡头政治虚有其表的自由主义的伪装，进行过反对各种形式的大地主统治的斗争，嘲笑过英国国教教会的伪善贪婪，攻击过两个机构，金融寡头政治的两个最鲜明的化身——“针线街的老太太”（英格兰银行）和“马克沃姆先生之流”（国家债权人），他曾经建议废除国债，没收教会领地，取消各种纸币。他探究了政治集权怎样一步步地侵犯地方自治的权利，并且谴责这种侵犯，认为它破坏了英国臣民的权利和自由。他不懂得这就是工业集中的必然结果。他提出的所有政治要求后来都写在人民宪章里，但是他的这些要求，实际上并不是工业无产者而是工业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宪章。他有平民的本能和平民的感受，但是在理性认识上却很少超出资产阶级改良的范围。一直到1834年，他去世以前不久，在颁布了新的济贫法之后，他才开始猜测到，现在的工业巨头如同大地主、银行家、国家债权人以及英国国教教会的僧侣一样，都是与人民为敌的。如果说，威廉·科贝特是现代宪章运动者的先驱，那末在另一方面，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他又是个顽固的约翰牛。他是大不列颠的最保守又最激进的人物；他是古老的英国最纯真的化身，同时又是年青的英国最勇敢的预告者。他认为英国从宗教改革时期起开始衰落，英国人民的意气从1688年所谓光荣革命的时候起开始消沉。因此，在他的心目中，革命不是向新天地过渡，而是回到古老的世界，不是新纪元的开端，而是“美好的古老时光”的复还。他恰好没有看到，他所想象的英国人民衰退的时期，正好是资产阶级地位开始提高、现代商业和工业发展的时期，并且随着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日益恶化，地方自治消亡，让位于政治集权。从十八世纪起随着古老英国社会的解体而发生的重大变化打破了他的幻想。使他心里充满苦闷。他看到了事物的后果，却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不理解正在开创自己事业的那些新的社会力量。他没有看到现代资产阶级，只看到一部分贵族世代垄断着国家的官职，通过立法手续来批准资产阶级的新需要、新野心所要求的一切变化。他看到了机器，但没有看到使机器开动的那种背后的力量。所以，在他的心目中，1688年以来的一切变化应该完全由辉格党人负责，他们是使英国衰落，使英国人民退化的祸首。因此他才对辉格党抱着刻骨的仇恨，不断地揭露辉格党的寡头政治。因此才出现这样一个使人惊奇的事实：威廉·科贝特是一位本能地保卫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侵犯的卫士，但所有的人都认为，而且他本人也认为，他是维护工业资产阶级利益、反对世袭贵族的战士。作为一位作家来说，他仍然是无与伦比的。

马克思：《累亚德的质询。——围绕着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1853年7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14—215页

威廉·科贝特（1762—1835年），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争。——编者注 17

论伏尔泰、卢梭、狄德罗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它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一切人类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和这些原理矛盾的现实，实际上被上下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405页

认为人类（至少在现时）总的说来是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这种信念，是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绝对不相干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同自然神论者伏尔泰和卢梭一样，几乎狂热地抱有这种信念，并且往往为它付出最大的个人牺牲。如果说，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就这句话的正面的意思说）而献出了整个生命，那末，例如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

伏尔泰，弗朗斯瓦·玛丽（1694—1778年），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编者注

卢梭，让·雅克（1712—1778年），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然神论哲学家。——编者注

99900260_176_3 狄德罗，德尼（1713—1781年），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之一，启蒙运动者，百科全书派的领袖。——编者注

关于法国革命黑格尔这样写道：“正义思想、正义概念立刻得到了公认，非正义的旧支柱不能对它作任何抵抗。因此，正义思想现在就成了宪法的基础，今后一切都必须以它为根据。自从太阳照耀在天空而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起，还从来没有看到人用头立地，即用思想立地并按照思想去构造现实。阿那克萨哥拉第一个说，Nus 即理性支配着世界；可是直到现在人们才认识到思想应当支配精神的现实，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这时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种精神的热忱，仿佛第一次达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谐。”（黑格尔《历史哲学》1840年版第535页）难道现在不应当用反社会党人法去反对已故的黑格尔教授的这种危险的颠覆学说吗？

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228页

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所使用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否定的否定。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0页

……在本来意义的哲学之外，他们也能够写出辩证法的杰作；我们只要提一下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和卢俊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就够了。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417页

至于说到唯物主义者，请看百科全书派的首领狄德罗对贝克莱的批评：“那些只承认自己的存在和我们体内彼此更替着的感觉的存在，而不承认其他任何东西的哲学家，叫作唯心主义者。这种怪诞的体系，在我看来，只有瞎子才会创造出来！这种体系虽然荒谬之至，可是最难驳倒，说起来真是人类智慧的耻辱、哲学的耻辱。”狄德罗非常接近现代唯物主义的看法（认为单靠论据和三段论法是不足以驳倒唯心主义的，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理论上的论证），他指出唯心主义者贝克莱的前提和感觉论者孔狄亚克的前提的相似之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30页

论罗伯斯比尔、丹东

巴黎公社和克罗茨都是主张宣传战争的，认为这是唯一的拯救手段，而公安委员会却玩弄外交手腕，它害怕欧洲同盟，想通过分裂同盟的办法去寻求和平。丹东想同英国媾和，即同福克斯以及希望通过选举取得政权的英国反对派媾和。罗伯斯比尔在巴塞尔同奥普两国密谋，想同它们达成协议。这两个人共同反对公社，以便首先把那些想要宣传战争，想要在整个欧洲传播共和制度的人们推倒。他们居然胜利了，公社（阿贝尔、克罗茨等人）的脑袋落地了，可是，从这时起，那些想单独同英国缔结和约的人和那些想单独同德国一些邦缔结和约的人之间就不可能有和平了。英国的选举结果对皮特是有利的：福克斯被拒之于政府之外已有好几年了，这就损害了丹东的地位；罗伯斯比尔胜利了，丹东被砍去了脑袋。可是（阿韦奈耳对这一点强调得不够），在那时，为了使罗伯斯比尔能在当时的国内条件下保持住政权，使恐怖达到疯狂的程度是必要的，但到了1794年6月26日，即在弗略留斯之役取得了胜利以后，这种恐怖就完全是多余的了，因为这一胜利不仅解放了边境，而且把比利时、间接地把莱茵河左岸都交给了法国，而那时罗伯斯比尔也就变成多余的了，他终于在7月27日垮了台。

恩格斯：《致维·阿德勒》（1889年12月4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11—312页

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和他们的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混淆了以真正的奴隶制为基础的古代理论民主共和国和以被解放了的奴隶制即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现代唯灵论民主代议制国家。一方面，不得不以人权的形式承认和批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即工业的、笼罩着普遍竞争的、以自由追求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无政府的、塞满了自我异化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个性的社会，另一方面又想在事后通过单个的人来取缔这个社会的各种生命表现，同时还想仿照古代的形式来建立这个社会的政治首脑，这是多么巨大的错误！

这种错误是悲剧性的，圣茹斯特在临刑之日指着悬挂在康瑟尔热丽大厅里的那块写着“人权宣言”的大牌子，以自傲的口吻说道：“但创造这个的毕竟是我。”就在这块牌子上宣布了人的权利，而这种人不会是古代共和国的人，正象他的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不是古代的一样。

这里不是替恐怖主义者的错误做历史的辩解的地方。

正好相反，世俗的历史却告诉我们：罗伯斯比尔倒台以后，从前想获得空前成就并耽于幻想的政治启蒙运动，才初次开始平凡地实现。尽管恐怖主义竭力要使资产阶级社会为古代政治生活制度牺牲，革命还是把资产阶级社会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正式承认了这个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14年9—11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1758—1794年），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雅各宾专政时期革命政府的首脑，——编者注

丹东，若尔日·雅克（1759—1794年），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之一，雅各宾派的右翼领袖。——编者注

指1789—1794年资产阶级的巴黎公社。——编者注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6—157页

把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政治的继续”，即把争取解放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和垂死的，即帝国主义的，即掠夺全世界的、反动的、联合封建主来镇压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拿来对比，也就等于把尺度和重量拿来对比一样。这就象把罗伯斯比尔、加里波第、热里雅鲍夫等“资产阶级代表”和米勒兰、萨兰德拉、古契柯夫等“资产阶级代表”拿来对比一样。如果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些革命家具有世界历史所承认的权利，来代表曾经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把千百万新兴民族提高到过文明生活的资产阶级“祖国”讲话。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627—628页

法国革命的英雄们根本没有在国家的原理中寻找社会缺陷的根源，相反地，他们却认为社会缺陷是政治上混乱的原因。例如，罗伯斯比尔把大贫和大富仅仅看做纯粹民主的障碍，因此他想建立一种普遍的斯巴达式的朴素生活。政治的原则就是意志。可见，政治理智越是片面，因而越是成熟，它就越相信意志是万能的，就越分不清意志的自然界限和精神界限，因而也就越不能发现社会疾苦的根源。

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1844年7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0—481页

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放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者第一次胜利的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总之，要按照至今人们所知道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 *de l'audace, de l'audace, encore de l'audace!* [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去行动。

恩格斯：《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1845年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5页

论拿破仑

拿破仑是革命的恐怖主义对这次革命所公开宣布的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政治的最后一次战斗的体现。的确，拿破仑已经了解到现代国家的真正本质；他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社会的无阻碍的发展、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等等是这种国家的基础。他决定承认和保护这一基础。他不是一个空想的恐怖主义者，但是，拿破仑还是把国家看做目的本身，而把市民生活仅仅看做司库和他的不能有自己的意志的了属。他用不断的战争来代替不断的革命，从而完成了恐怖主义。他充分地满足了法兰西民族的利己主义，但是他也要求资产阶级在为了达到侵略的政治目的而需要的时候牺牲自己的事业、享乐、财富等等。当他专横地压制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主义（即他的日常实践的政治理想主义）的时候，只要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重要的物质利益（即商业和工业）一和他拿破仑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他也同样毫不珍惜它们。他对工业琐事的轻视是他对思想家的轻视的补充。而在内政方面，他反对资产阶级社会，把资产阶级社会当做他仍然作为绝对的目的本身来体现的国家的敌人。例如，他曾在枢密院宣称，他不容许大土地所有者任意耕种或不耕种自己的土地。他那由国家掌管马车运输从而使商业受国家支配的计划也有同样的意义。法国的商人策划了首次动摇拿破仑的实力的事件。巴黎的证券交易者用人工制造饥饿的办法迫使拿破仑把向俄国的进攻几乎推迟了两个月，结果把这次进攻推到了年底。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7—168页

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象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诚然，他的行动表现出来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会的代表们可能表现出来并且实际上已经到处表现出来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贵族们所惯于表现出来的一半。在法国已完成其任务的恐怖统治，拿破仑以战争的形式把它搬到了其他国家，这种“恐怖统治”德国是十分需要的。拿破仑摧毁了神圣罗马帝国，并以并小邦为大邦的办法减少了德国的小邦的数目。他把他的法典带到被他征服的国家里，这个法典比历来的法典都优越得多；它在原则上承认平等。拿破仑强迫一向只为私人利益而生活的德国人去努力实现伟大的理想，为更崇高的公共利益服务。但是，正是这一点弄得德国人都起来反对他。正是由于他采取了把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措施，所以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因为他触犯了他们的偏见和他们的古老的习俗。正是由于他采取办法替德国的工厂工业打下基础，所以引起了资产阶级的不满，因为禁售一切英国商品、和英国进行战争虽然促使德国建立自己的工业，但是同时也引起了咖啡、食糖、烟草和鼻烟价格暴涨，当然这就足以引起爱国的德国店铺老板们愤怒了。此外，他们都是些不能领会拿破仑的伟大计划

拿破仑（1769—1821年），法国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又称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指拿破仑颁布的三部主要法典：民法（1804年）、商法（1807年）和刑法（1810年）。——编者注

的人。他们诅咒他，因为他把他们的子弟抓去打仗；而这些战争都是用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钱搞起来的。但是他们却把这类英国人当做朋友加以颂扬，虽然这些人正是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这些人靠这些战争大发横财，他们不但在战时，而且在战后都欺骗德国人，把德国人当做自己的工具。德国人咒骂拿破仑，因为他们想继续过苟且偷安的生活，保留自己原来那种可怜的生活方式，只关心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利益，因为他们根本不想过问任何伟大的理想和公共的利益。而最后，当拿破仑的军队被俄国击溃的时候，他们便乘机摆脱掉这位伟大征服者的铁链。

……对这个非凡的人物的评价，除去上面所说的，我还补充一点，那就是他统治得愈久，他就愈应该遭到他最终的命运。在他做皇帝这件事情上我并不准备责备他。在资产阶级已在法国确立了统治而人民又漠不关心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别的出路，因为资产阶级从不关心公共利益，只要他们私人的事情进行得顺利就行，而人民又看不到革命对自己有根本的好处，他们只具有战争的热情。但是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图得到和他们同样的荣誉，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统的帝王们便把篡夺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

恩格斯，《德国状况》（1845年10月15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6—638页

拿破仑是充分表现了1789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农民阶级把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的门面上，就是宣布要对外国进行战争，在国内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斗争。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他们举着旗帜，奏着音乐走向投票箱，高呼：‘Plus d’impôts, à bas les riches, à bas la république, vive1, Empereur!’——“取消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隐藏在皇帝背后的是一个农民战争。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1850年1月—1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9页

法国大革命的战争起初是民族战争，而且也确实是这样的战争。这些战争都是革命的：保卫伟大的革命，反对反革命君主国的联盟。但是，当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帝国，奴役欧洲许多早已形成的、有生命力的民族大国的时候，法兰西的民族战争便成了帝国主义战争，而这种帝国主义战争又反过来引起了反对拿破仑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7月）。
《列宁选集》第2卷第850页

拿破仑第一当时对普鲁士的摧残和侮辱比威廉现在对俄国的摧残和侮辱要厉害得多。好多年来，拿破仑第一在大陆上一直是所向无敌的，他当时战胜普鲁士比现在威廉战胜俄国要彻底得多。但是几年之后，普鲁士还是恢复

了元气，并且在解放战争中，利用了决不是同拿破仑进行解放战争而是同它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强盗国家的援助，推翻了拿破仑的压迫。

拿破仑的帝国主义战争继续了许多年，占去了整整一个时代，表现了帝国主义关系和民族解放运动交错在一起的异常复杂的情景。结果，历史经过了充满战争和悲剧（各国人民的悲剧）的这一整个时代，从封建主义向“自由的”资本主义前进。

列宁：《不幸的和约》（发表于1918年2月24日）。《列宁全集》第27卷第37页

有人引证拿破仑，硬说希特勒的行动象拿破仑，他的一切都象拿破仑。但是，第一、在这方面不应当忘记拿破仑的命运。第二、希特勒象拿破仑不过是小猫象狮子一样，因为拿破仑是依靠进步力量来反对反动力量，而希特勒则相反，是依靠反动力量来反对进步力量。

斯大林：《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1941年11月6日）。《斯大林文选》第280页

我这里讲的帝国主义是泛指对别的国家的掠夺，帝国主义战争是指掠夺者为了瓜分这些赃物进行的战争。（列宁原注）

论马志尼

在目前情况下，马志尼的任何声明都是一个比互相角逐着的各个内阁的外交公文或来自战场的五光十色的公报更值得注意的事件。尽管人们对罗三执政之一的品格看法多么不同，但谁也不会否认三十年来意大利革命是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而且在这同一时期欧洲承认他是他的同胞的民族愿望的出色表达者。如今他做出了一件英勇过人的、具有爱国主义自我牺牲精神的非凡壮举。他一个人冒着牺牲自己声誉的危险，大声疾呼地反对自我欺骗、盲目狂热和自私谎言这种巴比伦的混乱语言。他对波拿巴、亚历山大和这两个暴君的代理人卡富尔之间协商好的行动计划所作的揭露，尤其应当仔细地加以估量，因为大家知道，在欧洲所有非官方人士中，马志尼具有最广泛的手段来洞悉各个占统治地位的大国的见不得天日的秘密。他劝告人民志愿军要划清自己本身的事业和那些僭称王者事业之间的界限，永不辱没自己的宣言，不让自己的宣言被路易一拿破仑这个可耻的名字所玷污，这些劝告都被加里波第准确地实行了。

马克思：《马志尼宣言》（1859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06页

马志尼先生最近给法国皇帝写了一封信，从文学的观点来看，这封信大概在他的著作中要占首屈一指的地位。马志尼的许多作

品所固有的那种假装热情、一味夸大、冗长噜 和故弄玄虚的现象（这可以说是他所创立的那个意大利文学派别的特征），在这封信里只能看到少许的痕迹，同时可以看到，他的视野已变得较为广阔。到现在为止，他一直是欧洲共和派形式主义者的领袖。这些人只注意国家的政治形式，而不能理解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的社会组织的意义。他们以其虚伪的理想主义自豪，认为研究经济现实有损自己的尊严。

马克思：《马志尼和拿破仑》（1858年3月30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50页

看来，马志尼至少还在原地未动，也不能不这样。不论他的浮夸的呼吁多么笨拙，但它们在崇尚辞藻的意大利人中间仍然会取得一些成效。可是，瞧瞧无限活跃的人物科苏特吧！这个人在整个这次事件以后就绝对死气沉沉了。1853年再放肆夸耀这类引人发笑的野心而不受惩罚，已经不可能了。不论马志尼对起义的抽象激情多么荒谬，但他毕竟比勇敢的科苏特不知要高出多少。科苏特又在扮演他在维丁扮演过的角色，并且从安全的避难所跑出来，毫无结果地胡乱下令解放祖国。这个家伙确实是个胆小鬼和微不足道的人。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2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15页

马志尼，朱泽培（1805—1872年）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之一，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著名活动家，1849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1850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五十年代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864年成立第一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下，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编者注

我认为马志尼的政策是根本错误的。他鼓动意大利立即同奥地利决裂，他的活动只是有利于奥地利。另一方面，他忘记了：他应当面向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深受压迫的那部分意大利人，即农民，他忘记了这一点，就是在为反革命准备新的后援。马志尼先生只知道城市以及城市中的自由派贵族和“有教养的公民”，意大利农村居民（他们同爱尔兰的农村居民一样，都遭到了敲骨吸髓的压榨，经常被弄得精疲力尽，愚昧无知）的物质需要，对马志尼的世界主义的、新天主教的、痴心妄想的宣言里的那一套高谈阔论来说，当然是太卑下了。但是毫无疑问，要向资产阶级和贵族说明：使意大利获得独立的第一步就是使农民得到完全的解放，并把他们的对分租佃制变为自由的资产阶级所有制，这确实是需要勇气的。马志尼似乎认为，借一千万法郎要比争取一千万人更革命一些。我很担心，奥地利政府在紧要关头会自己动手去改变意大利的土地占有制形式，会按照“加里西亚的方式”去进行改革。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1年9月11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1—532页

我说：那末马志尼也是你们的组织的成员吗？

马克思博士说（含笑）：啊，不是！如果我们不超出他的思想，我们的成就是不会很大的。

我说：您的话使我感到惊奇。我一直相信，他是最进步的观点的代表。

马克思博士说：他代表的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旧思想。我们是不愿意和资产阶级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他和那些德国教授一样，落后于现代运动，而在欧洲，这些德国教授到现在还被认为是未来的高度发展的民主主义的使徒。也许在1848年以前，当英国人所谓的德国资产阶级刚刚获得发展的时候，他们是这样的人。可是现在，这些教授们都倒向反动派，无产阶级再不知道他们了。

附录：《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1871年7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7卷第684—685页

论加里波第

在意大利，当时纯粹的工场手工业还占统治地位，大工业还处于襁褓之中。工人阶级还远远没有被完全剥夺和无产阶级化；它在城市中还占有它自己的生产资料，在农村里，工业劳动是占有土地的小农或者佃农的副业。因此，资产阶级的毅力还没有受到它和有阶级觉悟的现代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破坏。而因为意大利的分割状态仅仅是由于外来的奥地利统治才存在下来，在这种统治的保护下，君主们把苛政推行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占有土地的大贵族和城市人民群众也都站在资产阶级这一争取民族独立的先锋战士一边。可是，在 1859 年，外来的统治除了在威尼斯以外都被推翻了，法俄两国已使奥地利不能再干涉意大利，已不再有人害怕这种干涉了。而意大利也出了一个有古代风的英雄——加里波第，他能够创造奇迹，并且已创造了奇迹。他率领千人志愿军，推翻了整个那不勒斯王国，实际上统一了意大利，粉碎了波拿巴政策的人为罗网。意大利得到了自由，而且实际上得到了统一，——但是，这并不是由于路易专破仑施展了阴谋，而是由于进行了革命。

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1887 年 12 月—1888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472—473 页

奥军低估了这个人，把他叫做土匪头儿。其实，只要他们很好地研究一下罗马围攻战以及他由罗马向圣马力诺进军的历史，那末他们一定会认识到他是一位具有非凡的军事天才而且英勇超群和足智多谋的人物。他们不这样做，却对他的袭击漠然视之，就象对待 1848 年阿勒曼迪率领的伦巴第志愿军的入侵一样。他们完全没有看到这个事实，就是加里波第是个要求严格的人，他的部下大部分在他指挥之下已经有四个月，在这个期间足以使他们学会小规模战争中常用的战法和运动方法。

恩格斯：《战略》（1859 年 5 月 30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403—404 页

……加里波第这样的人，既具有一颗火热的心，又兼有某些只有在但丁和马基雅弗利身上才能发现的灵敏的意大利天才。

马克思：《普鲁士现状。——普鲁士、法国和意大利》（1860 年 9 月 27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第 199 页

关于加里波第从马尔萨拉向巴勒摩这次令人惊奇的进军的详细情况，我们在听到许多极其矛盾的消息以后，终于获得了看来相当可靠的报道。的确，这是本世纪最惊人的战绩之一；如果不是这位革命将领在这次胜利进军以前就卓有声誉，这样的战绩几乎是无法解释的。加里波第的胜利证明，那不勒

加里波第，朱泽培（1807—1882 年），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之一。——编者注

指加里波第。——编者注

斯工国军队仍然对这个曾经在法军、那不勒斯军和奥军面前一直高举意大利革命旗帜的人感到恐惧，而西西里人民对于他以及对于民族解放事业则没有丧失信心。

恩格斯：《加里波第在西西里》（1860年6月7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69页

现在我们应当说，加里波第为了准备强攻巴勒摩而采取的机动，立刻表明他是一位非常高明的将领。在这以前，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同时也很走运的游击队领袖；即使在罗马被围期间，他的那种用不断出击来保卫城市的战术也差不多没有使他得到一个合适的时机超出这个水平。但是，这一次他所解决的纯粹是战略任务，经过这次考验以后，他已是一位公认的军事专家了。他赖以成功地欺骗了那不勒斯军队总司令、使后者犯下大错而让一半军队远离城市的那种方法，他的迅速的侧敌行军和在巴勒摩城下最出人意料的方向上的重新出现，以及他利用守军被削弱的时机所采取的坚决的强攻，——所有这些，要比1859年意大利战争期间所作的一切更为突出地表现了他的军事天才。西西里起义得到了一位第一流的军事领袖；我们希望，不久将作为政治家而登上舞台的加里波第，将不会玷污他作为军事家的荣誉。

恩格斯：《加里波第在西西里》（1860年6月7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73页

随着事变的发展，我们已开始了解加里波第制订的解放意大利南部的计划。我们对这个计划了解得越深刻，就越是赞叹它的宏伟。只有在象意大利这样的国家里，才能够设想出这样的计划或是企图实现它，因为在这里民族派组织得这样出色，而且完全处于一个为意大利统一和独立的事业而战并取得辉煌胜利的人的控制之下。

恩格斯：《加里波第的进军》（1860年9月1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163页

现在我们有了关于加里波第占领南卡拉布里亚和该地的那不勒斯守军已经完全瓦解的详细材料。加里波第在他辉煌事业的这一阶段，表现出他不仅是勇敢的领袖和卓越的战略家，而且还是足智多谋的统帅。以主力对连绵的海岸堡垒线进攻，这一行动不仅需要军事天才，而且需要有军事知识。因此，可以满意地指出，虽然我们的英雄一生中并没有经过一次军事考试，而且恐怕从来也没有在正规军队中服务过，但在这个战场上却同在其他任何战场上一样行动自如。

恩格斯，《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亚》（1860年9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168页

论林肯

美国人民在开创劳动解放的新纪元中曾把领导的责任付托给两位劳动的人：一位是阿伯拉罕·林肯，另一位是安德鲁·约翰逊。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1865年5月2日和9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09页

我们在林肯先生再度当选总统时给他的贺信中表示过，我们确信，美国的国内战争对于工人阶级的发展，同美国独立战争对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具有同样巨大的意义。

马克思：《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1869年5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02页

林肯总统——一个在法律上小心谨慎、从宪法来谋求和解、出生在肯塔基这个边界蓄奴州的人——总是很不容易挣脱“忠诚的”奴隶主的控制，极力避免同他们公开决裂，因此，他就要同北部的一些坚持原则的并且日益被事变进程推向前台的党派发生冲突。

马克思：《美国废奴派的示威》（1862年8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63页

林肯总统在大势之所趋和人心之所向都不许再拖以前，是从来不冒险朝前走一步的。但是，只要《old Abe》[“老阿伯”（阿伯拉罕·林肯）]一旦相信这样一种转折点已经到来，他就会采取某种突然的、尽可能不声不响的行动而使朋友和敌人都同吃一惊。最近，他就用极其平静的方式干出了一桩出人意料的事，这件事如果放在半年以前，可能要以他的总统职位作代价，即使在几个月以前，恐怕也会引起一阵辩论的风暴。这里我们指的是麦克累伦技免除了指挥联邦所有军团的 commander in chief [总司令] 的职务一事。首先，林肯用一个精明强干而不讲客气的律师爱得文·斯坦顿先生替换了陆军部长凯麦隆。接着，斯坦顿就向布埃耳、哈勒克、巴特勒、薛尔曼等将军及其他各军区司令官和讨伐军长官发出指令说，今后一切命令，无论是通告性的或机密性的，一律直接自陆军部取得，同时，他们必须直接向陆军部报告。最后，林肯发布了几项命令，用宪法授予他的《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Army and Navy》[“陆海军总司令”] 的名义签署。用这种“不声不响”的办法，那位“年轻的拿破仑”就被解除了他对所有军团的

最高指挥权，只有波托马克河线上的军团留给他指挥，虽然《Commander in chief》的头衔还给他保留着。在林肯总统接收最高指挥权之初，就顺利

林肯（1809—1865年），美国第十六任总统（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林肯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颁布了有名的《解放黑奴宣言》，平定了南方奴隶主的叛乱，1865年4月，林肯被奴隶主反动势力暗杀。——编者注

“年轻的拿破仑”是民主党队伍中拥护麦克累伦的人给他取的绰号，因为他是美军历史上第一个在比较年轻（34岁）时就做总司令的将军。——编者注

地从肯塔基、田纳西和大西洋海岸传来了一些捷报。

马克思：《美国近事》（1862年2月26日左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05—506页

林肯是史册上《sui generis》[“有其独特之处的”]人物。他从不首倡什么，从不表现激情，从不装出姿态，从不使用历史帷幔，最重大的行动，他也总是使之具有最平凡的形式，别的人在为几平方英尺土地行动时可以宣布“为理想而奋斗”，而林肯即使在为理想而行动时，他所谈的也只是“几平方英尺土地”，他犹豫不决地、违背本意地、勉强地演唱着他这个角色的雄壮歌词，好象是在请人原谅他是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充当英雄人物”似的。他向敌人迎面投掷过去的、永远也不会失去其历史意义的最严厉的法令，都象——他本人也力求使它们象——一个律师送交对方律师的普通传票，象在法律上玩弄狡计，象小气地附有种种保留条件的 *actiones jurtis* [诉状]。他不久以前发表的宣言，这份在联邦成立以来的美国史上最重要的文件，这份撕毁了旧的美国宪法的文件——林肯关于废除奴隶制度的宣言，也具有这种性质。

要想从林肯的所作所为中找出美学上的不雅、逻辑上的缺陷、形式上的滑稽和政治上的矛盾，象英国的那些奴隶制度的品得——《泰晤士报》、《星期六评论》*tutti quanti* [之流]所做的那样，是再容易不过了。尽管如此，在美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林肯必将与华盛顿齐名！在今天，当大西洋这一边所发生的一切无足轻重的事情都故意带上了不起的神气的时候，那在新大陆上以如此平凡的形式所进行的一切重大事件，难道没有任何意义吗？

林肯不是人民革命的产儿，是那种没有意识到本身应当解决何等伟大任务的普选制的寻常把戏把他——一个从石匠上升到伊利诺斯州参议员的平民，一个缺乏智慧的光辉、缺乏特殊的性格力量、地位并不十分重要的人，一个善良的常人——送上最高位置的。新大陆还从来没有取得过比这一次更大的胜利，这证明，由于新大陆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善良的常人也能担负旧大陆需要英雄豪杰才能担负的任务！

马克思：《北美事件》（1862年10月7日）。《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86—587页

当旧大陆和新大陆都群情激愤的时候，我们的任务不是要倾泻悲痛和愤怒的言辞。就连那些被雇用的诽谤者，他们成年累月地、不辞劳苦地、息息法斯式地对阿伯拉罕·林肯和他所领导的伟大共和国进行了精神上的暗杀，现在也在人民的这种愤懑情绪的总爆发面前吓得目瞪口呆，争先恐后地将辞令的花朵撒满他的陵墓。他们现在终于明白了：这是一个不会被困难所吓倒，不会为成功所迷惑的人；他不屈不挠地迈向自己的伟大目标，而从不轻举妄动，他稳步向前，而从不倒退；他既不因人民的热烈拥护而冲昏头脑，也不因人民的情绪低落而灰心丧气；他用仁慈心灵的光辉缓和严峻的行动，用幽默的微笑照亮为热情所蒙蔽的事态；他谦虚地、质朴地进行自己宏伟的工作，决不象那些天生的统治者那样做一点点小事就大吹大擂。总之，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的人物，这位出类拔萃和道德高尚的人竟是那样谦虚，以致只有在他成为殉难者倒下去之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
(1865年5月2日和9日之间)。《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16卷第108—109页

论孙中山

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实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7月15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2页

但是中国民粹主义者 的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

……

因此，这个中国民主主义者 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和纲领，事实上仅仅是“改变”“不动产”的“一切法律基础”的纲领，仅仅是消灭封建剥削的纲领。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7月15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4页

尽管中国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有很大缺点（由于它没有无产阶级这个支柱而耽于幻想和优柔寡断），但是中国革命民主派，为着唤醒人民，为着争取自由和彻底民主的制度，仍然作出了许多贡献。孙中山的这个党，只要吸引中国越来越广泛的农民尽快投入运动，参与政治，就能日益成为（随着这种吸引的程度）亚洲进步和人类进步的伟大因素。不管那些以国内反动势力为靠山的政治骗子、冒险家和独裁者可能使这个党遭到什么样的失败，但是这个党的工作永远都不会是徒劳无功的。

列宁：《中国各党派的斗争》（1913年4月18日）。
译文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2期

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和纲领，事实上仅仅是“改变”“不动产”的“一切法律基础”的纲领，仅仅是消灭封建剥削的纲领。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7月15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4页 尽管中国革命民主派的领袖孙中山有很大缺点（由于它没有无产阶级这个支柱而耽于幻想和优柔寡断），但是中国革命民主派，为着唤醒人民，为着争取自由和彻底民主的制度，仍然作出了许多贡献。孙中山的这个党，只要吸引中国越来越广泛的农民群众投入运动，参与政治，就能日益成为（随着这种吸引的程度）亚洲 指孙中山。——编者注 二

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和纲领，事实上仅仅是“改变”“不动产”的“一切法律基础”的纲领，仅仅是消灭封建剥削的纲领。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7月15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4页 尽管中国革命民主派的领袖孙中山有很大缺点（由于它没有无产阶级这个支柱而耽于幻想和优柔寡断），但是中国革命民主派，为着唤醒人民，为着争取自由和彻底民主的制度，仍然作出了许多贡献。孙中山的这个党，只要吸引中国越来越广泛的农民群众投入运动，参与政治，就能日益成为（随着这种吸引的程度）亚洲 指孙中山。——编者注 二

孙中山的民粹主义的实质，他的进步的、战斗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改革纲领以及他的所谓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就在这里。

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理论。因为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孙中山可以说是以其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粉碎了自己反动的民粹主义理论，承认了生活迫使他承认的东西：“中国正处于工业”（即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前夜”，中国“商业”（即资本主义）“将大大发展”，“五十年后我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即拥有几百万人口的资本主义财富和无产阶级贫困的中心。

最后，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一定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7月15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5、157页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你们一起哀悼国民党的领袖的逝世，哀悼争取中国人民的自由和自主，争取中国的统一和独立的工农民族解放斗争的组织者的逝世。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毫不怀疑，孙中山的伟大事业是不会和孙中山一同死去的，孙中山的事业将恬在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的心里，而使中国人民的敌人发抖。

斯大林：《俄共（布）中央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5年3月13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45页

论波拿巴

在波拿巴身上，帝位僭望者和破产冒险家的身分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认定自己负有使命恢复帝国，同时他又认定，法国人民负有使命替他偿清债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41页

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些流氓无产者身上才能找到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做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这就是不加掩饰的波拿巴。他这个老奸巨猾的痞子，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这种生活所演出的一切悲剧，都看做最鄙俗的喜剧，看做专以华丽的服装、词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化妆跳舞会。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52页

路易一拿破仑现在成了欧洲资产阶级的偶像。这不仅是因为他在1851年12月2日“拯救了社会”，当时，他虽然借此消灭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但只是为了拯救它的社会统治。不仅是因为他表明了，普选制在有利的情况下可以变成压迫群众的工具；不仅是因为在他的统治下工业、商业、特别是投机事业和交易所欺骗勾当盛况空前。而首先是因为，资产阶级认为他是同它骨肉相连的第一个“大政治家”。他象任何真正的资产者一样，也是暴发户。他曾“历尽千辛万苦”：在意大利是烧炭党人的密谋家，在瑞士是炮兵军官，在英国是负债累累的贵族流浪汉和特别警察，可是，无论在何时何地，他都是王位追求者，——就是这样一个人以自己的冒险经历，以自己在一切国家里的道德败坏行为，使自己成了法国人的皇帝，并成为欧洲命运的主宰，就象典型的资产者——美国人通过一系列真正的和欺骗性的破产使自己成为百万富翁一样。他做了皇帝之后，不仅使政治为资本家发财致富和交易所欺骗勾当服务，而且完全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来推行政治本身，用“民族原则”来进行投机。使德国和意大利处于分割状态，对法国以往所执行的政策来说，曾经是法国的一种不可让予的基本权利；路易一拿破仑则立即着手零星售卖这种基本权利以换取所谓补偿。他愿意帮助意大利和德国消除分割状态，但是有一个条件：德国和意大利向民族统一方面每前进一步，都要割让领土给他做报酬。这样一来，不仅使法国沙文主义得到满足，不仅使帝国逐步向1801年的疆界扩展，而且又使法国重新处于特别开明的、解放各民族的强国地位，使路易一拿破仑处于各被压迫民族的保卫者的地位。于是，整个开明的、为民族理想所振奋的资产阶级——因为它非常关心从世界市场上肃清一切阻碍商业的东西，——都异口同声地欢呼这一解放世界的开明活动。

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1887年12月

—1888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
第471—472页

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万第。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4页

波拿巴既被他的处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并且他作为一个魔术师不得不以日新月异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他看做拿破仑的替身，换句话说，就是不得不每天举行小型的政变，于是他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陷于全盘混乱状态，侵犯一切在1848年革命中看来是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一些人对革命表示冷淡而使另一些人奋起进行革命，以奠定秩序为名而造成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又使整个国家机器失去圣光，读犯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他模仿礼拜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的仪式在巴黎布置礼拜拿破仑皇袍的仪式。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03页

乍看起来，好象现在路易一拿破仑是作为一个绝对的主宰统治着法国，好象除了他本人的权力之外，唯一的权力就是那些把他团团包围起来的宫廷阴谋家（他们为了独占这位法国独裁者的宠爱和垄断对他的影响而互相倾轧）的权力了。但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路易一拿破仑胜利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他是依靠同他的名字相联系的传统才得以在一个短时期内保持住法国社会中相互斗争的阶级之间的均势。因为，虽然表面上处于以军事专制作后盾的戒严状态（法国现在正处于这种戒严状态的笼罩下），社会上各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事实上仍在继续进行，而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

恩格斯：《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1852年2—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08页

这个波拿巴真是一头不可救药的蠢驴。这个畜生对历史运动毫无概念，全部历史是一堆偶然事件的大杂烩，没有任何联系，起决定作用的是老江湖骗子的小骗术，而且是什么样的骗术呵！对付任何事变，总是只用同一个处方。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0年5月19日）》。《马

论梯也尔

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出他的说谎才能了。他的社会活动编年史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5月30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57页

这个矮子 喜欢在欧洲面前挥舞拿破仑第一的宝剑，——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就是一味替拿破仑第一擦靴子的，——实际上，他的对外政策，从1840年的伦敦公约起到1871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这场内战止，始终是把法国引到极端屈辱的地步。在这场内战中，他蒙伸斯麦的恩许，把在色当和麦茨被俘的军人驱去攻打巴黎。虽然他有些随机应变的本事，虽然他的主张反复无常，但是他终生都极端墨守陈规。不言而喻，现代社会中比较深刻的变动，始终是他所不能理解的秘密；他那副头脑的全部精力都用来耍嘴皮了，所以甚至连社会表面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也不能领悟。例如，他不倦地把一切违反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都指斥为渎犯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曾经嘲骂铁路是荒诞的怪物；而当他在路易·波拿巴时代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时，他把任何改革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企图都斥为大逆不道了。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益处的事情。梯也尔始终不渝的，只是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财富生产者的憎恨。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5月30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59—360页

他 在官场上已经混了四十年。在政治或生活的任何方面，他从来没有倡导过一项有益的措施。他好虚荣、喜猜疑、贪图享乐，从来没有写过和谈过正经事。在他看来，事物本身只是供他动笔杆耍嘴皮的因由。除了对高官厚禄和自我炫耀的渴求之外，他身上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甚至于他的沙文主义也不例外。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57页

梯也尔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侵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会生涯同样卑鄙龌龊，——甚至在现在，当他扮演法兰西的苏拉这个角色时，还是情不自禁地用他那可笑的傲慢态度显示出他的行为的卑污。

梯也尔（1797—1877年），法国反动政客。1871—1873年任法国总理、总统。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

——编者注

指梯也尔。——编者注

指梯也尔。——编者注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60页

要想找到与梯也尔和他那些嗜血豺狼的行为多少相象的东西，就必须回到苏拉和前后罗马三执政的时代去。同样是冷酷无情地大批杀人；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同样是拷打俘虏；同样是残酷迫害，不过这一次是迫害整个阶级；同样是野蛮地追究隐藏起来的领袖，使他们无一幸免：同样是纷纷告发政治仇敌和私敌；同样是任意摧残根本和斗争无关的人们。不同处只在于罗马人没有多管炮来整批整批地击毙俘虏，他们没有“手持法律”，没有口喊“文明”罢了。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3页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9页

你是不是知道现在被法国人捧上了天的若米尼？我只是从梯也尔先生的讲话里知道他的，大家知道，梯也尔无耻地抄袭过他的东西。这个矮小的梯也尔是当今仅有的最不要脸的撒谎家之一，没有一次战役他能举得出正确的数字。由于若米尼先生后来投奔了俄国人，所以他当然有理由不会象梯也尔先生那样把法国人的英勇业绩描写得神乎其神，在梯也尔的书里，一个法国人总是能打败两个敌人的。

恩格斯：《致约·魏德迈（1851年6月19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78页

可是，高尚的梯也尔的著作是从萨瓦里——他的回忆录在法国是享有盛名的——那里抄袭的，他的剽窃术决不亚于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同时，不仅在流言蜚语方面，而且在治理问题等等方面，他都把萨瓦里先生当作主要的来源。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5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58页

指梯也尔及其一伙。——编者注

若米尼，昂利（1779—1869年），瑞士人，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写有许多关于战略和军事史方面的著作。——编者注

萨瓦里，安·让·玛丽·勒奈，罗维戈公爵（1774—1833年），法国将军，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编者注

论俾斯麦

俾斯麦是德国反革命地主的代表。他知道只有同反革命自由资产阶级建立巩固的联盟才能拯救他们（在数十年内）。他建立了这个联盟，因为无产阶级的反抗软弱无力，同时，幸运的战争又帮助解决了当时首要的任务：德国民族的统一。

列宁：《关于立宪民主党人马克拉格夫的演说》
（1913年6月初）。《列宁全集》第19卷第121页

在北德意志联邦存在的整个时期，俾斯麦在经济方面是很乐意迎合资产阶级的，甚至在讨论议会的权限问题时，他所显示的也不过是带着天鹅绒手套的铁拳。这是他的最风头的时期；有时甚至会令人怀疑，他是不是真具有特殊的普鲁士狭隘性，他是不是真没有能力理解在世界历史中除了军队和以军队为基础的外交计谋以外还有其他更强大的力量。

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1887年12月—1888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97页

俾斯麦就是路易-拿破仑，是个从法国冒险主义的王位追求者变成了普鲁士土容克和德国大学学生会会员的路易—拿破仑。完全象路易—拿破仑一样，俾斯麦是一个头脑十分实际和非常狡猾的人，是一个天生的、巧于机变的生意人，换一换场合，真可以在纽约交易所里同万德比尔特家族和杰伊·古耳德家族较量一番，而他的私人事业也的确干得很不错。但是，同这种在实际生活方面发达的头脑相联系的，往往是一种相应的狭隘眼界，而在这方面，俾斯麦则超过了他的法国前辈。后者在流浪时期毕竟亲自制订了一种“拿破仑观念”——诚然，是按照他自己的尺寸做成的，——而俾斯麦，我们将会看到，却从来没有弄出一点点自己的政治观念来，而只是把别人的现成观念拼凑在一起。可是，这种狭隘性恰好是他的幸运。否则，他就根本干不出从特殊的普鲁士观点出发去设想全部世界历史的事来：要是在他的这种极端普鲁士的世界观上面有一个小洞，透点阳光进来，那他就会对他的全部使命感到茫然，而他的荣誉就会到此结束。的确，当他按自己的方式执行了他的特殊的、外部强加于他的使命时，他也就走进了死胡同；我们将会看到，由于他根本缺乏合理的观念，由于他无法理解他自己所创造的历史形势，他不得不进行怎样的跳跃。

如果说，路易—拿破仑由于他过去的经历，已习惯于在选择手段方面无所顾忌，那末，俾斯麦从普鲁士政策的历史中，特别从所谓大选帝侯和弗里德里希二世政策的历史中，学会了更少顾虑地行事，从而他就能保持着一种自命高尚的想法：他在这一点上一直是忠实于祖国传统的。他那务实的敏感教导他，必要时应当收一收自己的容克贪欲；而一到看起来没有必要这样做

俾斯麦（1815—1898年），曾任普鲁士首相、北德意志联邦首相和德意志帝国首相，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代表。——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

时，这种贪欲就又突出地显露出来；这当然是一种没落的象征。他的政治的方法便是大学学生会会员的方法：他把在大学生酒馆中借以逃出圈套的那种对喝啤酒惯例所做的滑稽的字面解释，在议院中毫不客气地应用于普鲁士宪法；他在外交上所实行的全部新花招，都是从大学学生会的学生那里抄袭来的。但是，如果说路易—拿破仑在紧要关头往往摇摆不定，譬如在 1851 年政变时，莫尔尼不得不积极地用暴力迫使他去完成业已开始的事业，又如在 1870 年战争前夜，他的犹豫不决毁坏了他的整个地位；那末，应当说，在俾斯麦身上，就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他从来没有失掉过意志的力量；在很久以前，这种力量就变成了公开的野蛮举动。而他的成功的秘密首先就在这里。德国的所有统治阶级，不论是容克还是资产者，已经失掉了最后一点点毅力，在“有教养的”德国，缺乏意志已经习以为常了，以致在他们中间唯一真正还有意志的人正因为如此就成了他们的最伟大人物和统治他们大家的暴君，在他面前，他们违背理智和良心，象他们自己所说的，情愿“跳过棍子”。当然，在“没有教养的”德国，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工人已经表明，他们有一种甚至俾斯麦的坚强意志也无法对付的意志。

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1887 年 12 月—1888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486—487 页

在德国方面，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但是，究竟是谁把德国弄到必须处于防御的地位呢？是谁使路易·波拿巴有可能对德国进行战争呢？正是普鲁士！正是俾斯麦曾和这个路易·波拿巴暗中勾结，以期摧毁普鲁士内部的民主反对派，并使霍亨索伦王朝兼并德国。如果萨多瓦之役不是打胜而是打败了，那末法国军队就会以普鲁士盟友资格蹂躏德国。普鲁士在得胜之后，难道有片刻想过要以一个自由的德国去和一个被奴役的法国相对抗吗？恰恰相反！它细心保存了自己旧制度固有的一切妙处，并且还加上了第二帝国的一切好猾伎俩：它的实际的专制制度和虚伪的民主精神，它的政治欺骗把戏和财政欺诈手腕，它的漂亮的言词和最下流的诈骗行为。这样，以前只是在莱茵河的一岸盛行的波拿巴制度，现在在它的另一岸上也同样盛行起来了。在这种情形下，除了战争还能期待什么呢？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1870 年 7 月 19—23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39—340 页

我们只指出一点。俾斯麦能够实行改良，就是因为他越出了改良主义的范围，大家都知道，他完成了一系列的“上层革命”，他从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个国家掠夺了五十亿法郎，他可以给那些被大量黄金和空前未有的军事胜利弄得如醉如痴的人民以普选权以及真正的法制。

列宁：《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1913 年 1 月 29 日）。《列宁全集》第 18 卷第 533 页

俾斯麦依照自己的方式，依照容克的方式完成了历史上进步的事业，但是，谁要想根据这点来证明社会主义者应当帮助俾斯麦，那这个“马克思主

义者”真是太好了！此外，俾斯麦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把分散的受异族压迫的德国人联合在一起。

列宁：《论大俄罗斯人民的民族自豪感》（1914年12月12日）。《列宁全集》第21卷第86页

论梅特涅

但是，城市资产阶级愈来愈富裕，其影响也愈来愈大，和工业齐头并进的农业的进步也改变了农民对地主的地位。资产阶级和农民反对贵族的运动愈来愈带有威胁性。由于农民到处都是民族局限性和地方局限性的体现者，农民运动必然带有地方性质和民族性质，所以与农民运动一起又产生了民族之间的旧的斗争。

在这种形势下，梅特涅完成了他的杰作。他消除了贵族（除了最有势力的封建贵族以外）对国家事务的任何影响。他把那些最有势力的金融贵族拉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削弱了资产阶级，——他必须这样做，财政状况要求他这样做。于是，他依靠上层封建贵族和金融贵族，依靠官僚和军队，在比他的一切竞争者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实现了君主专制的理想。他利用每一个民族的贵族和其他各民族的农民的帮助，把各该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置于自己统治之下；同时他又利用各民族的贵族对各该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恐惧心理，把各民族的贵族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各种不同的阶级利益，民族局限性和各种地方偏见，尽管错综复杂，总是处在适度的抗衡状态中，使老奸巨猾的骗子手梅特涅有可能自由地施展他的伎俩。他唆使各族人民互相倾轧究竟收到了什么效果，加里西亚的大屠杀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梅特涅利用染上了宗教狂热病和民族狂热病的卢西族农民，把为了农民利益而掀起的波兰民主运动镇压下去了。

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1849年1月8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96页

梅特涅公爵的政府所遵循的两个方针是：第一，使奥地利治下的各民族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受到所有其他处于同样境地的民族的牵制；第二（这是一切君主专制的基本原则），依靠封建地主和金融巨头这两个阶级，同时使这两个阶级的权势和力量互相平衡，以便政府保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以各种封建收益作为全部收入的土地贵族，不能不支持政府，因为政府是他们对付压迫的农奴阶级（他们靠掠夺这些农奴为生）的唯一靠山。而每当他们之中较不富裕的一部分起来反对政府的时候（例如1846年加里西亚的情形），梅特涅立刻就纵使这些农奴去反抗他们，因为这些农奴总是力图抓住机会来狠狠地报复他们的直接压迫者的。另一方面，交易所的大资本家由于大量投资于公债，也受到梅特涅政府的束缚。奥地利在1815年恢复了它的全部实力，1820年后又在意大利恢复和维持了君主专制，1810年的破产又免除了它的一部分债务，所以，在媾和之后，它很快就在欧洲各大金融市场重新建立了信用；而信用愈是增长，它也就愈是加紧利用这种信用。于是，欧洲的一切金融巨头都把他们的很大一部分资本投于奥地利的公债。他们全部需要维持奥地利的信用，而要维持奥地利的国家信用又总是需要新的借款，于是他们便不得时常增加新的贷款，以维持他们过去已经投资的债券的信用。1815年以后的长期和平，以及表面上看来奥地利这样一个千年帝国不可能倾覆的假象，使梅特涅政府的信用惊人地增长，甚至使它可以不依赖维也纳的银行家

梅特涅，克雷门斯（1773—1859年），公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文家，反动分子；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和首相（1821—1848），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编者注

和证券投机商了；因为只要梅特涅还能够在法兰克福和阿姆斯特丹得到足够的资金，他当然就能心满意足地看着奥地利的资本家们在他的脚下俯首听命。而且，他们在其他方面也得仰承他的鼻息。银行家、证券投机商、公用事业承包商虽然能够经常从君主专制获得大宗利润，但这是以政府对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具有几乎是无限的支配权作为交换条件的。因此，他们丝毫也不会反对政府。这样，梅特涅便有把握能够获得帝国中最有力量和最有权势的两个阶级的支持，此外他还拥有军队和官僚机构，它们组织得非常适合于为专制政府服务。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1852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3—524页

梅特涅在自己实力最雄厚的年代就已认识到了这种危险性，并且觉察到了俄国的阴谋。他使用他所有的一切手段来镇压了这个运动。但是他所使用的一切手段可以用一个词来说明，那就是迫害。而唯一有效的手段——德意志和匈牙利的精神的自由发展完全可以驱散斯拉夫怪影——是同他的一套卑鄙的政策相矛盾的。

恩格斯：《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1855年4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223—224页

（在这里，梅特涅好象是神圣同盟的一只十字圆网蛛，坐在慢慢在奋起争取自由的各族人民周围编结起来的蛛网的正中）

马克思、恩格斯：《维也纳和法兰克福》（1849年3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97页

论巴贝夫

巴贝夫的共产主义是从第一次革命时期的民主制度产生的。第二次革命（1830年革命）却产生了另一种影响更大的共产主义。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10月23日和11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9—580页

总的说来，市民等级在和贵族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托马斯·闵采尔派，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武装起义，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而在十八世纪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了；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8页

大家知道，1793年宪法是由依靠起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制定的，恐怖统治是由这个政党实行的，罗伯斯比尔的覆亡表明资产阶级战胜了无产阶级，巴贝夫和他的同谋者从1793年的民主思想中给平等作出了当时最进步的结论。法国革命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社会运动，在它之后，纯粹政治上的民主已经变为毫无意义的东西了。

恩格斯：《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1845年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1页

真正能动的共产主义政党出现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被废除的时候。首先宣布这些“社会问题”的是最彻底的共和主义者，即英国的“平均主义者”、法国的巴贝夫和邦纳罗蒂等。巴贝夫的朋友和党内同志邦纳罗蒂所写《巴贝夫的密谋》一书表明这些共和主义者怎样从历史“运动”中得出一种信念：随着君主制和共和制这一社会问题的消失，还没有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是对无产阶级有利的。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3—174页

巴贝夫，格拉古（1760—1797年），法国革命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平等派”密谋的组织者。——编者注

摩莱里，十八世纪法国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编者注

马布利，加布里埃尔（1709—1785年），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编者注

民主制和任何其他一种政体一样，最终总要破产，因为伪善是不能持久的，其中隐藏的矛盾必然要暴露出来；要末是真正的奴隶制，即赤裸裸的专制制度，要末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即共产主义。这二者在法国革命以后都出现过；前者以拿破仑为代表，后者以巴贝夫为代表。关于巴贝夫主义，我想可以不必多讲，因为邦纳罗蒂写的关于这个密谋的历史已经译成英文。共产主义者的密谋未能实现，因为当时的共产主义自身还是非常幼稚非常庸浅的，同时社会舆论也还不够开展。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10月23日和11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6—577页

“以劳动为基础的公众福利”这一公式过于确定地表现了当时平民的博爱渴望。在公社倾覆以后的长时期中，在巴贝夫使这一点具有一种确定的形式以前，没有一个人能说他们想要什么东西。如果说具有博爱渴望的公社来得太早了，那末巴贝夫就来得太晚了。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9年2月20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5页

论圣西门、傅立叶、欧文

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的补充》（1874年7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0—301页

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诚然，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看到了统治着的社会本身中的破坏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

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是同工业的发展步调一致的，所以这些发明家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规律，以便创造这些条件。

这样，社会的活动就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就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就要由他们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的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1—282页

但是，了解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市民等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市民等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说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虽然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但是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优越的是：在1814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1815年百日战争时，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以及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和平的唯一保障。在1815年向法国人宣传和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建立同盟，这确实既要有勇气又要有历史远见。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0—411页

圣西门（1760—1825年），法国人；傅立叶（1772—1837年），法国人；欧文（1771—1858年），英国人。三人都是十九世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编者注

其次一个大力主张社会改革的法国人就是圣西门伯爵。他创立了一个学派，甚至还建立了几个移民区，但这些移民区没有一个办成功的。从总的精神看来，圣西门的学说和英国罕考门派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很相似，虽然在做法和看法上，有些细节还有很大的不同。圣西门派奇特的言行很快就受到了法国人的冷嘲热讽；在法国，凡是成为嘲笑对象的东西就一定要毁灭。不过除此而外，圣西门派的移民区遭到破产还有其他原因。该派的全部学说都笼罩了一层不可理解的神秘主义的云雾，因此，起初也许还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可是最终便不能不使人大失所望。他们的经济学说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他们公社的每个社员分得的产品，首先是以他的工作量、其次是以他所表现的才能决定的。德国共和主义者白尔尼正确地批驳了这一点，他认为才能不该给以报酬，而应看做先天的优越条件；因此为了恢复平等，必须从有才能的人应得的产品中间扣除一部分。

圣西门主义很象一颗闪烁的流星，在引起思想界的注意之后，就从社会的地平线上消失了。现在没有一个人想到它，没有一个人谈起它；它的时代过去了。

和圣西门差不多同一个时候，还有另一个人——傅立叶——用自己非凡的智慧研究了人类社会制度。虽然傅立叶的著作不象圣西门及其门徒的著作那样闪耀出天才的光芒，虽然他的文体有些晦涩，而且作者在表达法文还没有适当字眼表达的那些看法和思想的时候常常显得非常吃力，可是我们却更乐于读他的著作，并且从中看到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也更多。固然这些著作也并不是没有最荒唐的神秘主义的色彩；可是，把它剔除以后，剩下来的就是圣西门派的著作所没有的东西，也就是科学的探讨，冷静的、毫无偏见的、系统的思考，概括地说，就是社会哲学；而圣西门主义只能叫做社会诗歌。正是傅立叶第一个确立了社会哲学的伟大原理，这就是：因为每个人天生就爱好或者喜欢某种劳动，所以这些个人爱好的全部总和就必然会形成一种能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力量。从这个原理可以得出下面一个结论：如果每个人的爱好都能得到满足，每个人都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那末，即使没有现代社会制度所采取的那种强制手段，也同样可以满足一切人的需要。这种论断尽管听起来是非常武断，可是经过傅立叶论证以后，就象哥伦布竖鸡蛋一样，成了无可辩驳的、几乎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傅立叶证明，每个人生下来就有一种偏好某种劳动的习性；绝对懒惰是胡说，这种情形从来未曾有过，也不可能有；人类精神本来就有活动的要求，并且有促使肉体活动的要求；因此就没有必要象现今社会制度那样强迫人们活动，只要给人们的活动天性以正确的指导就行了。接着他确立了劳动和享受的同一性，指出现代社会制度把这二者分裂开来，把劳动变成痛苦的事情，把欢乐变成大部分劳动者享受不到的东西，是极端不合理的。然后他又指出，在合理的制度下，当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工作的时候，劳动就能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成为一种享受。我在这里当然不能把傅立叶的自由劳动理论全部加以叙述，可是我想上面讲的已足以使英国社会主义者相信，傅立叶主义是完全值得他们注意的。

傅立叶的另一个功绩就是他指出了协作的优越性，不仅如此，他还指出了它的必然性。这一点我只要顺便提一下就行了，因为我知道，英国人对协作的意义是了解得很透彻的。

可是，傅立叶主义还有一个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彻底的地方，就是

它不主张废除私有制。在傅立叶主义的法伦斯泰尔即协作社中，有富人和穷人，有资本家和工人。全体社员的财产构成股份基金，法伦斯泰尔经营商业、农业和工业，所得的收入按以下的方式分给社员：一部分作为劳动报酬，另一部分作为对技艺和才能的报酬，再一部分作为资本的利润。原来在关于协作和自由劳动的一切漂亮理论后面，在慷慨激昂地反对经商、反对自私和反对竞争的连篇累牍的长篇言论后面，实际上还是旧的经过改良的竞争制度，比较开明的囚禁穷人的巴士底狱！当然我们不能停在这一点上；而法国人也确实没有停在这一点上。

傅立叶主义在法国传播得很慢，但从未间断过。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10—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7—579页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灾祸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5页

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者是厂主欧文，所以他的社会主义虽然在实质上要超越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在形式上仍然以极宽容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同时在许多方面都对无产阶级很不公道。社会主义者十分驯顺温和；不管现存的制度如何坏，他们还是承认它，因为他们除争取社会舆论外，对改变现存制度的其他一切途径是一概否定的。然而他们的原则又这么抽象，如果他们的原则保持现在的形式，他们是永远也不能争得社会舆论的。此外，社会主义者还经常抱怨下层阶级道德堕落，他们看不见社会制度的这种瓦解中的进步成分，看不见只会追求私利的伪善的有产

阶级更严重的道德堕落。他们不承认历史的发展，所以他们打算

一下子就把国家置于共产主义的境界，而不是进一步开展政治斗争以达到国家自行消灭[sich selbst auflöst]的目的。他们固然了解工人为什么痛恨资产者，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唯一能够引导工人前进的愤怒并没有什么用处，并宣扬对英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更加没有什么用处的慈善和博爱。他们只承认心理的发展，只承认和过去毫无联系的抽象的人的发展。可是整个世界，包括每一个单独的人在内，都是从过去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大学究气、太形而上学了，他们是做不出什么大事来的。他们之中一部分人是来自工人阶级的，但是工人阶级中倾向于他们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虽然这一部分人是最有教养的和最坚强的。社会主义在其现有的形式下决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公共财产，因此，它必须降低自己的水平，暂时回到宪章主义的观点上来。但是，经过宪章运动的考验并清除了资产阶级成分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宪章运动的领袖（他们几乎全是社会主义者）那里形成起来，它很快就会在英国人民的历史发展中起突出的作用。比法国共产主义的基础宽广得多、但是在发展方面却落后于法国共产主义的英国社会主义，应当暂时回到法国的观点上来，以便将来再超过它。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

社会主义者运动的创始人欧文写的许多小册子都是仿照德国哲学家的笔法，也就是说，写得根糟，但有时他的思想突然明朗起来，这时他那些晦涩的写作就变得容易了解了；可是，他的见解是渊博的。照欧文的说法，“婚姻、宗教和财产是自有世以来就存在的一切祸害的唯一原因”（！！）；在他所有的著作里充满了对神学家、法律家和医学家的猛烈攻讦，他把他们一概而论。“陪审法庭的组成人员都是一些仍然完全听从神学支使的人，因而他们都抱有偏见；法律也浸透了神学，因此也应和陪审法庭一起废除。”

恩格斯：《伦敦来信》（1843年5—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68—569页

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名望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造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是什么：官场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被逐出了官场社会，受到了报刊的封锁，他由于以全部财产在美洲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而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三十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成就，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

恩格斯：《反社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3—304页

论卡贝

亡命英国的法国人卡贝受到了当地共产主义思想的鼓舞，当他回到法国时，他已经成了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页

1839年的起义已经带有明显的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性质。但是，起义之后发生了老密谋家抱怨不已的分裂，分裂是由于工人们要弄清本阶级的利益而引起的，分裂部分地发生在旧有的密谋家组织中，部分地发生在新的宣传组织中。卡贝在1839年后不久便开始积极进行的共产主义宣传，共产主义党派内部发生的争论问题，很快就超过了密谋家的认识水平。谢努和德拉奥德部承认，在接近二月革命的时候，共产主义者无疑已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最强大的一派。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1850年3—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23页

至于说到体系本身，那末，差不多所有的体系都是在共产主义运动开始时出现的，当时它们通过民间小说的形式来为宣传事业服务，这些民间小说同刚刚参加到运动中来的无产者的尚未成熟的意识是完全符合的。卡贝把自己的《伊加利亚》称为roman philosophique[哲学小说]，我们在把卡贝作为一个派别的首领来加以评价时，不应当根据他的体系，而应当根据他的论战性的著作和他的整个活动。在这些小说中间，有一些，例如傅立叶的体系，充满了真正的诗的色彩；另外一些，例如欧文和卡贝的体系，则缺乏任何的幻想，而带有商人的斤斤计较的痕迹，或者从法律上狡猾地迎合那个需要感化的阶级的观点。在派别的发展过程中，这些体系失去了任何意义，最多不过作为口号在名义上保留下来。在法国谁会去相信“伊加利亚”，而在英国谁会去相信欧文的计划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3页

我们还是回头来谈谈伊加利亚派共产主义者的社会理论吧。他们的《圣经》是卡贝慈父——顺便提一下，这位卡贝曾经做过检察官和众议院议员——著的《Voyage en Icarie》（《伊加利亚旅行记》）。伊加利亚派移民区的一般组织情况和欧文先生的移民区没有多大区别。伊加利亚派共产主义者的计划吸取了圣西门和傅立叶计划中一切合理的东西，因此他们大大超过了先前的法国共产主义者。至于对婚姻制度的态度，那他们和英国人是完全相同的。他们尽一切可能来保证个人自由。刑罚必须废除，代之以对青年人的教育和对成年人的正当的精神影响。

卡贝，埃蒂耶纳（1788—1856年），法国政论家，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行记》一书的作者，1841—1849年是《人民报》编辑。——编者注

可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社会主义者一般都反对基督教，他们被迫忍受那些真正基督徒所具有的种种宗教偏见，而属于一个以不信教著称的民族。法国共产主义者反倒是基督徒。他们最喜欢的一个公式就是：基督教就是共产主义（《le christianisme c'est le Communisme》）。他们竭力想用圣经，用最早的基督徒过的就是公社式的生活等话来证明这个公式。可是这一切只是说明了，这些善良的人们决不是最好的基督徒，尽管他们以此自居。因为他们如果真是最好的基督徒，那他们对圣经就会有更正确的理解，就会相信即使圣经里有些地方可以做有利于共产主义的解释，但是圣经的整个精神是同共产主义、同一切合理的创举截然对立的。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10—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2—583页

论魏特林

德国的社会主义在 1848 年以前很久就产生了。起初它有两个独立的派别。一方面是纯粹工人运动，即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支流；这个运动产生了作为它的发展阶段之一的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其次是由于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而产生的理论运动；在这一派中马克思的名字从一开始就占有统治地位。1848 年 1 月出现的《共产主义宣言》标志着两个派别的融合，这个融合是在革命熔炉中完成和巩固起来的，在这革命的熔炉中，他们所有的人，不论工人还是过去的哲学家，都同样地为了共同的幸福而冒了生命的危险。

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1891 年 10 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88 页

至于当时工人阶级中那些确信单纯政治变革全然不够而认为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分子，他们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种共产主义还是颇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并已在工人阶级当中强大到足以形成法国卡贝的和德国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可见，在 1847 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方面，是“有身分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 年英文版序言》（1888

年 1 月 30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36—237 页

社会改革问题最近在德国又成了讨论的对象，但这次是在工人阶级中间讨论了。德国的工厂工业很不发达，因此大部分工人都是手工业者；他们在定居下来成为一个小师傅以前，都要在德国、瑞士、而且往往在法国逛上几年。这样以来，就有很多德国工人陆续到巴黎去并从那里回来，而在那里必然要接触到法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其中有一个叫威廉·魏特林的，是普鲁士马格德堡人，普通的帮工裁缝，他决定在自己的祖国建立共产主义公社。

这个可以算是德国共产主义创始者的人，在巴黎住了几年以后，就到了瑞士，在日内瓦的一家裁缝店工作，这时，他向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宣传他的新福音。他在日内瓦湖畔的所有的瑞士城镇，建立了共产主义联合会，在那里做工的大部分德国人都对他的思想表示同情。他这样取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以后，就着手出版一种定期刊物《年轻一代》，在这个国家扩大自己的宣传。虽然这份杂志只是给工人看的，文章也是工人写的，但从一开始它就胜过了法国共产主义者办的大部分刊物，甚至胜过了卡贝慈父办的《人民报》。从这份杂志可以看出，杂志编辑为了取得一个政论家不可或缺的、从有限的几年教育里不能得到的历史知识和政治知识，是下过一番功夫的。这份杂志还说明了，魏特林曾不断地努力把自己对于社会的各种观点和思想综合成一种完整的共产主义体系。《年轻一代》杂志 1841 年开始出版；第二

魏特林，威廉（1808—1871 年），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著名活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之一，职业是裁缝。——编者注

年，魏特林发表了《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他这本书评述了旧社会制度，描绘了新社会制度的轮廓。将来我也许要从这本书摘出几段寄给你们。

这样，魏特林在日内瓦及其近郊建立了共产党的核心以后，就到了苏黎世；那里也和瑞士北部其他城市一样，他的一些朋友对工人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影响。现在他开始在这些城市组织自己的党。一些讨论社会改革问题的联合会以歌咏俱乐部的名义成立了。这时，魏特林表示要出版《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一书。可是就在这时候，警察便来干涉了。

今年6月，魏特林被捕了。他这本书没等出版就和他的文件一起被没收。共和国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审理这个案件，然后向议会——民选的代表机关——提出关于这个案件的报告。这个报告已在几个月以前公布。从这个报告可以看出，瑞士每个地方都有很多共产主义联合会，其中大部分成员是德国工人；魏特林被看作共产党的领导者，并且常常收到有关运动情况的报告；他和德国人在伦敦、巴黎建立的同样的联合会有通信联系；所有这些由经常变更住所的人组成的团体无非是“危险的、空想的学说”的温床，它把自己最有经验的成员派往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并以自己的思想感染一切影响所及的工人。报告的起草人是布伦奇里博士。他是一个贵族，基督教的狂热拥护者，因此，他写的一切与其说是一篇冷静的官方报告，不如说是一封挟嫌陷害的告密书。这篇报告把共产主义说成旨在推翻整个现存制度和破坏社会一切神圣关系的最危险的学说。此外，这位虔诚的博士再找不出更厉害的字眼来表示他对这些卑贱无知的人们亵渎神明的粗野行为（他们竟想引用圣经来为自己不道德的革命学说进行辩护）的愤怒心情。魏特林及其政党在这个问题上抱着和法国伊加利亚派同样的看法，也宣称基督教就是共产主义。

魏特林案件的结局远不是苏黎世政府所预料的那样。虽然魏特林及其朋友不止一次地谈吐失慎，可是加在魏特林头上的叛国和谋反罪名并未得到证实。刑事法庭判处魏特林六个月徒刑，并永久驱逐出瑞士；苏黎世各联合会的会员被驱逐出州境；苏黎世政府将这一报告转发各州政府并照会各外国使馆。可是在瑞士的其他地方，共产主义者并没有遭到多大损害。迫害开始得太晚了，并且没有得到其他各州比较有力的支持。这一迫害根本没有消灭共产主义，反倒给它带来了好处，它使所有操德语的国家对它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以前在德国几乎谁都不知道的共产主义，由于这些事件，在那里却成了众目所矚的问题。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10月23日和11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6—588页

恢复了的同盟大大扩展起来了。例如在瑞士，魏特林、奥古斯特·贝克尔（一个智慧非凡的人，但也象许多德国人一样由于本身的不稳定而垮台）和其他人建立了一个或多或少忠于魏特林共产主义体系的坚强组织。这里不是批评魏特林共产主义的地方。但是，对于它作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次独立理论运动所具有的意义，至今我还同意马克思在1844年巴黎《前进报》上所说的话：“（德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论著中的那种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庸气拿来和德国

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这双无产阶级巨人的童鞋拿来和资产阶级侏儒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这位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这个大力士今天已站在我们面前，虽然他还远远没有发育完全。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年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9页

可是，魏特林共产主义则是一种自成系统的并且刊印成著作的东西。

我刚才想到，你大概需要库尔曼的一本书，——这种“先知者的宗教”是继魏特林之后在瑞士出现的，并把魏特林的很多门徒拉了过去。我完全忘记了把这本书交给施留特尔。

随信附上魏特林给赫斯的一封信（取自档案馆）。魏特林同我们的决裂是在关系密切的同志组成的小团体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生的。（与会的一位俄国人安年柯夫也描写过这次会议，几年前《新时代》曾转载了这些回忆。）情况是这样的：赫斯曾在威斯特伐里亚（比雷菲尔德等地）呆过，他告诉我们说，那里的人（吕宁、雷姆佩尔等人）想筹集资金出版我们的作品。这时魏特林就插了进来，他想在那里立即发表阐述他的空想体系的东西及其他一些巨著，其中还包括一部新的语法书，书中把第三格看作贵族的发明而废除了，如果这个计划实现的话，这一切正是我们当时应当加以批判和与之斗争的。这封信表明，我们的论据在魏特林的头脑中反映出来时被歪曲成了什么样子。他所看到的到处只是职业上的嫉妒，只是企图扼杀他的天才，“切断他的财源”。但是在他归纳的第五点和第六点中，毕竟相当明确地表明了他和我们之间原则上的对立，而这是最主要的。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88年10月25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10—111页

论布朗基

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关于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方案。布朗基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主要是一个“实干家”，他相信组织得很好的少数人只要在适当的时机做些革命变革的尝试，就能够通过最初的若干胜利把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实现胜利的革命。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布朗基当然只有通过秘密结社的形式才组成了这样的核心，于是便发生了通常在搞密谋时发生的情况：那些对永远的克制和马上就要干起来这种空洞诺言感到厌倦的人，终于再也忍耐不住了，开始闹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有一种选择：或者取消密谋，或者在没有任何外部导因的情况下开始起义。起义爆发了（1839年5月12日），但是立刻就被镇压下去。顺便说一句，这是布朗基的唯一的一次没有被警察局侦查出来的密谋；这次起义对警察局是一个晴天霹雳。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专政。

由此可见，布朗基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年5月—1875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8—589页

请您相信，我比任何人都更关心那位我一向认为是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头脑和心脏的人的命运。

马克思：《致路·瓦持（1861年11月10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12页

爱国主义思想起源于十八世纪的大革命；这个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公社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布朗基这位无可怀疑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就认为，把资产阶级的号召“祖国在危险中！”拿来作为他的报纸的名称是最合适不过的。

列宁：《公社的教训》（1908年3月23日）。《列宁全集》第13卷第453页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1805—1881年），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许多秘密社团和秘密活动的组织者。——编者注

指布朗基。——编者注

附：论科西迪耶尔

在二月革命的所有的领袖当中，科西迪耶尔是唯一具有乐天性格的人。他代表革命中的 loustic[乐天派]，是老职业密谋家们的十分适当的首脑人。他多情，幽默，是各种酒馆和咖啡馆的老主顾，他信守的原则是自己活，让别人也活，同时又象军人一样地勇敢，样子和蔼可亲，举止落落大方，但实际上却十分奸诈、狡猾和阴险，观察力也异常敏锐，具有一定的革命手腕和革命毅力。科西迪耶尔当时是个真正的平民，他本能地仇恨资产阶级，极为富有平民的热情。他刚一安置在警察局里，就秘密地反对“国民报”派，同时也没有忘记前任者的厨房和地下室。他立刻着手组织军事力量，保证自己手中有一个报社，成立俱乐部，安排人事，总之，他一开始活动就信心百倍。警察局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就变成了一座不怕敌人袭击的堡垒。但是，他的一切计划不是纸上谈兵，就是实际上毫无结果的纯粹平民式的狂妄行动。在矛盾尖锐化的时候，他的命运就和他的组织一样，在“国民报”派和象布朗基那样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间动摇不定，停滞不前。他的山岳党人已经分裂；老的 bambocheurs 不服从指挥，也已无法再加以制服，而革命的一部分则转向布朗基方面去了。科西迪耶尔本人在他的警察局长和人民代表的官场地位上越来越资产阶级化：5月15日，他小心谨慎地对事件采取旁观态度，而且以极不体面的方式在议会里为自己辩护；6月23日，他把起义者抛在一旁，让他们听天由命。他因此自然被逐出了警察局，而且不久以后被迫侨居国外。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1850年3—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26—327页

科西迪耶尔，马尔克（1808—1861年），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34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组织者之一；1848年二月革命后任巴黎警察局长，制宪议会议员；1848年6月流亡英国。——编者注

论蒲鲁东

蒲鲁东在欧洲工人运动史上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以致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忘掉。虽然他在理论上已经被驳倒，在实践中已经被排斥在一边，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历史的意义。谁要是稍微详细地研究现代社会主义，谁也就应当研究运动中的那些“已被克服的观点”。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1887年1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2页

蒲鲁东最初的试笔作品，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他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财产？》无疑是他最好的著作。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蒲鲁东在他那部著作中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关系，大致就象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系一样。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在蒲鲁东的这一著作中，风格方面还算强健的肌肉组织还占优势，——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而且我认为这种风格是这一著作的主要优点。可以看出，蒲鲁东甚至把他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也看做独立的发现；他所说的东西，对他自己说来都是新东西而且是被他当做新东西看待的。向经济学中“最神圣的东西”进攻的挑战性的勇气，用来嘲笑庸俗的资产阶级理性的机智的怪论，致命的批判，刻薄的讽刺，对现存制度的丑恶不时流露出来的深刻而真实的激愤，革命的真诚——《什么是财产？》就是以所有这些特性激动了读者，并且一出版就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在政治经济学的严格科学的历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这种耸人听闻的著作在科学中也象在小说文学中一样起着自己的作用。

马克思：《论蒲鲁东》（1865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0—141页

但是，蒲鲁东还力图赢得更大的胜利。他在写了许多未引起人们注意的小文章以后，终于在1846年出版了他那包括两大卷的《贫困的哲学》。在这部应使他名垂千古的著作中，蒲鲁东运用经过粗暴歪曲了的黑格尔的哲学方法来论证一种奇怪的、完全不正确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企图用形形色色的先验的魔法来论证一种自由工人联合的新社会主义体系。这个体系是如此之新颖，以致它在《Equitable Labour Exchange Bazaars or Offices》[“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或交换所”]的名称下，早在十年以前就在英国十个不同城市中破产过十次了。

这部冗长的、臃肿的伪科学著作，不仅对以往一切经济学家，而且对以往一切社会主义者进行了极其粗暴的指责，它没有给轻率的法国人留下任何印象。这种叙述和论断的方式他们从来还没有见到过，它比蒲鲁东上一部著作中的那些可笑的奇谈怪论还要更不合他们的胃口。这类奇谈怪论在这本书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1809—1865年），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编者注

中也颇不少（例如，蒲鲁东曾一本正经地宣布“他是耶和华的私人仇敌”），但是它们隐藏在伪辩证法的论断下面。法国人又宣称：《c'est un ouvrage remarquable》[“这是一部卓越的著作”]，并把它搁在一边。在德国，这部著作自然受到了较大的尊重。

马克思当时发表了一部既机智而又严正的著作来驳斥蒲鲁东（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布鲁塞尔和巴黎版）——这部著作按其思想方式和语言来说，要比蒲鲁东那部矫揉造作的荒唐东西千百倍地更带法国味。

至于蒲鲁东这两部著作中所包含的对现存社会关系的批评，那末，在读完这两本书之后，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这种批评等于零。

至于谈到蒲鲁东关于社会改造的计划，那末，如前面所说的，它们只有一个优点，即它们早在许多年以前就在英国的无数次破产中光辉地表现了自己。

这就是革命前的蒲鲁东。

恩格斯：《蒲鲁东》（1848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69—670页

在蒲鲁东的第二部重要著作《贫困的哲学》出版前不久，他自己在一封很详细的信中把这本书的内容告诉了我，信中附带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等待着您的严格的批评”。不久以后，我果然对他进行了这样的批评（通过我的著作《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其形式的激烈竟使我们的友谊永远结束了。

为了评价他的两卷厚厚的著作，我不得不介绍您看一下我的那部反驳他的著作。在那里，我顺便指出了，由于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这就表明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而且，他是如何拐弯抹角地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

其次，我还指出，他对他所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是多么不够，有时甚至是幼稚的；他同空想主义者一起追求一种所谓“科学”，以为由此就可以先验地构想出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而不从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不从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引导出科学，我特别指出，蒲鲁东对整个问题的基础——交换价值的理解始终是模糊、错误和不彻底的，他还错误地把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空想主义的解释看成一种新科学的基础。关于他的一般观点，我是用以下的话概述我的判断的：

“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鲁东先生没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经济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们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的那种幻想（而不是在

“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见我的著作第113页）

贫困中看到将会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的观念里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

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

上面这个判决尽管非常严厉，我现在仍然担保每个字都是正确的。

马克思：《论蒲鲁东》（1865年1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3—145页

您现在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了。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完全相反。必须改变范畴，而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

蒲鲁东先生想调和矛盾，因而完全避开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必须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呢？他完全象一个政治上的空论家，想把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一并当做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当做永恒的范畴。他只是寻求一个新公式，以便把这些力量平衡起来，而这些力量的平衡正是表现于其中各个力量时胜时败的现代运动。例如，在十八世纪，许多平庸的人物都曾努力发现一个真正的公式，以便把各个社会等级、贵族、国王、议会等等平衡起来，而第二天早晨就无论国王、议会、或贵族都没有了。这一对抗的真正平衡是推翻一切社会关系——这些封建体制和这些封建体制的对抗的基础。

由于蒲鲁东先生把永恒观念、纯粹理性范畴放在一边，而把人和他们那种在他看来是这些范畴的运用的实践生活放在另一边，所以他自始就保持着生活和观念之间、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元论——以许多形式重复表现出来的二元论。您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对抗不过是表明蒲鲁东先生不能了解他所神化了的各种范畴的世俗的起源和历史罢了。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9—330页

总括起来说，蒲鲁东先生没有超出小资产者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除了让我们回到中世纪的帮工或者至多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师傅的地位以外，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经谈到：人生在世，只要有一部杰作，只要有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人也就足够了。无论就形式或实质来说，这难道不正是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所要求的一部杰作吗？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6页

蒲鲁东的全部学说，都是建立在从经济现实向法律空话的这种救命的跳跃上的。每当勇敢的蒲鲁东看不出各种现象间的经济联系时——这是他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要遇到的情况，——他就逃到法权领域中去求助于永恒公平。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5页

蒲鲁东和拉萨尔的差别只在于拉萨尔是一个真正的法学家和黑格尔主义者，而蒲鲁东在法学和哲学方面，也如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样，却不过是一个涉猎者。

我知道得很清楚：以经常自相矛盾著称的蒲鲁东，有时在某些地方也发表一些意见，好象表明他很想根据事实来说明观念。但是，这些言论对他的思想的基本倾向说来是微不足道的，何况这些言论即使偶尔出现也表现得极其混乱和自相矛盾。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8页

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它的基础——商品生产，而是使这个基础免除各种弊病和赘瘤等等：不是消灭交换和交换价值，而相反地，是使它“确立”，使它成为普遍的、绝对的、“公允的”、没有波动、没有危机、没有弊病的东西，——这就是蒲鲁东思想。

蒲鲁东是小资产阶级，他的理论把交换和商品生产绝对化，把它当作宝贝……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12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17页

无政府主义者的“始祖”蒲鲁东说：世界上存在着一成不变的正义，这种正义应当成为未来社会的基础。因此蒲鲁东被称为形而上学者。马克思借助辩证方法和蒲鲁东作斗争，并证明说：既然世界上一切都在变化，那末“正义”也一定要变化，因而“不变的正义”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呓语（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发表于1906年12月—1907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80页

他那本关于《政变》的著作应当认为不仅是一部坏的著作，而且简直是卑鄙，然而适合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卑鄙，他在这里向路易·波拿巴献媚，实际上是竭力把他弄成适合法国工人口味的人物，他那篇反对波兰的最后的著作也是一样，在这里他为了迎合沙皇而表现了愚蠢的厚颜无耻。

指蒲鲁东的《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编者注

指蒲鲁东的《1815年的条约已不存在了吗？未来的代表大会决议书》。蒲鲁东在本书中反对修改1815年维也纳会议关于波兰的决议，反对欧洲民主力量支持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俄国沙皇制度的压迫政策辩护。——编者注

人们常常拿蒲鲁东和卢梭相比。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他更象尼·兰盖，不过兰盖的《民法论》是一部很有天才的著作。

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

马克思：《论蒲鲁东》（1865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7页

二月革命对蒲鲁东来说的确来得非常不是时候，因为正好在几星期前他还不容争辩地证明说，“革命的纪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在国民议会中的演说，虽然表明他对当前的情况很少了解，但仍然是值得极力称赞的。在六月起义以后，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动。此外，他的演说还有一个良好的结果，这就是梯也尔先生在反对蒲鲁东提案的演说（后来出了单行本）中向整个欧洲证明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精神支柱是建立在多么可怜而幼稚的教义问答的基础上。同梯也尔先生相比，蒲鲁东的确成了洪水泛滥前的庞然巨物了。

马克思：《论蒲鲁东》（1865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6页

论拉萨尔

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德国的社会主义只能秘密地存在。只是在1862年，马克思的学生拉萨尔才重新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但是这已经不是“宣言”中的大无畏的社会主义了；拉萨尔为工人阶级所要求的一切，不过是由国家资助成立生产合作社，这是在1848年以前追随马拉斯特的“国民报”的那一派巴黎工人的纲领的翻版，因此也就是纯粹的共和派针对路易·勃朗的“劳动组织”而提出的纲领的翻版。正如我们看到的，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是非常温和的。但是，它在舞台上的出现却标志着德国社会主义发展第二阶段的起点。这是因为拉萨尔靠自己的天才、勤奋和无限充沛的精力，竟然把工人运动发动起来了，十年来使德国无产阶级激动过的一切东西都同这个运动有肯定的或否定的、友好的或敌对的关系。

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1891年10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88—289页

让我们回忆一下德国的例子吧。拉萨尔对于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功绩何在呢？就在于他使这个运动脱离了它自发地（在舒尔采-德里奇之类的人的诚意协助下）走上的那条进步派的工联主义和合作社主义的道路。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就要进行与那种妄说什么轻视自发成分，什么过程策略，什么因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等等的废话完全不同的工作。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就要同自发性进行殊死的斗争，也正是由于多年来进行了这种斗争，柏林的工人（举例来说）才由进步党的支柱变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最好的堡垒之一。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
《列宁选集》第1卷第257页

拉萨尔具有非凡的才能和渊博的学识，这是一个精力充沛而且简直是无限灵活[Versatilität]的人：他可以说生来就是为了在一切场合扮演政治角色。但是，他既不是德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倡导者，也不是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他的著作的全部内容都是抄袭来的，而且在抄袭时还作了歪曲；他有一个先驱者，一个在智力上远远超过他的人，他一面把这个人的著作庸俗化，同时却对这个人的存在只字不提，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卡尔·马克思。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69年7月28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08页

拉萨尔整个伟大名声是由于多年来马克思容忍他把马克思的科学研究成果据为己有并用来装扮自己，而且他由于缺乏经济学素养，还歪曲了这些成果，如果这些人不了解这一点，那并不是我的过错。但是，我是马克思的著作方面的遗嘱执行人，所以我有一定的义务。

拉萨尔属于历史已有二十六六年了。如果他在非常法时期没有受到历史的

拉萨尔，斐迪南（1825—1864年），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律师。六十年代参加工人运动，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建人之一，他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派别。——编者注

指俾斯麦政府的反社会党人法，——编者注

批判，那末现在终于到了必须进行这种批判并弄清拉萨尔同马克思相比究竟应占什么地位的时候了。要知道，掩饰拉萨尔的真实面目并把他捧上天的那种神话，绝不能成为党的信念的象征。无论把拉萨尔对运动的功绩评价得多么高，他在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仍然具有两重性。同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形影不离的是蛊惑家拉萨尔。透过鼓动者和组织者的拉萨尔，到处显露出一个办理过哈茨费尔特诉讼案的律师面孔：在手法上还是那样无耻，还是那样极力把一些面目不清和卖身求荣的人拉在自己周围，并把他们当做单纯的工具加以使用，然后一脚踢开。1862年前，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波拿巴主义倾向的、典型普鲁士式的庸俗民主主义者（我刚才看了他写给马克思的那些信），由于纯粹个人的原因，他突然改变了方针并开始了他的鼓动工作。过了还不到两年，他就开始要求工人站到王权方面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性格和他相近的俾斯麦勾结在一起，如果他不是侥幸恰在那时被打死，那就一定会在实际上背叛运动。在拉萨尔的鼓动小册子中，从马克思那里搬来的正确的东西和他自己的并且通常是错误的议论混在一起，二者几乎不可能区分开来。由于马克思的评价而感到自己受到挫伤的那一部分工人，只是从拉萨尔两年的鼓动工作来了解拉萨尔，而且还是通过玫瑰色眼镜来看他的鼓动的。但是在这种偏见面前，历史的批判是不能永远保持毕恭毕敬的姿态的。我的责任就是最终一劳永逸地揭示出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的真正关系。这已经做了，我暂时可以因此而感到满足。况且我现在正忙于别的事情。而已经发表的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无情判断，自然会产生应有的影响并赋予别人以勇气。但是，假若情况迫使我非讲话不可，我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只有一劳永逸地肃清有关拉萨尔的神话了。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91年2月23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8—489页

首先，关于拉萨尔的联合会，它是在一个反动时期成立的。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十五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但是，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他受直接的时代条件的影响太深了。他把一个小小的出发点——他同舒尔采-德里奇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的对立——当做自己的鼓动的中心点：以国家帮助反对自助。这样，他不过是重新提出了法国天主教社会主义的首领毕舍为反对法国的真正的工人运动而于1843年和以后几年提出的口号。谁也不会糊涂到认为这个口号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拉萨尔只能以这个口号（似乎！）可以直接实现为理由来替这个口号辩护。为了这个目的，他不得不断言这个口号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实现。因此，这种“国家”就变成了普鲁士国家。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向普鲁士君主制、向普鲁士反动派（封建党派）、甚至向教权派让步。他把宪章派的普选权口号同毕舍的国家对协作社的帮助结合起来。他忽略了德国和英国的条件是不同的。他忽略了没落帝国在法国普选权问题上的教训。其次，就象每一个说自己的口袋里装有能为群众医治百病的万应灵丹的人一样，他一开始就使自己

指全德工人联合会。——编者注

舒尔采-德里奇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进步党首领立一，他宣传用工人自己的钱办储蓄贷款银行、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鼓吹劳资合作，引诱工人离开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编者注

指法兰西第二帝国。——编者注

的鼓动带有宗教的、宗派的性质。实际上，任何宗派都有宗教的性质。再次，正因为他是一个宗派的创始人，所以他否认同德国和外国以前的工人运动有任何天然的联系。他陷入了蒲鲁东的错误之中，他不是从阶级运动的实际因素中去寻找自己的鼓动的现实基础，而是想根据某种教条式的处方来规定这一运动的进程。

马克思：《致约·巴·施韦泽（1868年10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0—371页

拉萨尔和拉萨尔派认为走无产阶级的和民主的道路的可能性不大，于是他们就实行了动摇的政策，迁就俾斯麦的容克地主领导权。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使工人政党倾向于波拿巴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

列宁：《奥古斯特·倍倍尔》（1913年8月8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2—293页

至于拉萨尔向俾斯麦献媚，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布林德引证的话，拉萨尔确实在杜塞尔多夫的辩护词中说过，甚至还让刊登出来，因此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拉萨尔尽管有各种优点，他却具有犹太人那种看重瞬息间的成就的特点；因此他不能不对路易·波拿巴深感尊敬，不能不象他所做的那样露骨地说出波拿巴主义的原则。对于那些比较了解他的人来说，这并不是唯一的事实。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对这件事感到多么不愉快，就象猪仔布林德感到这是十分求之不得的事一样。单单这一事实，就足以使我们在拉萨尔活着的时候就不希望同他的整个鼓动有什么共同之处，况且我们也有其他的原因，但是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因而应当弄清楚，他的鼓动只是一时的冲动，还是在它背后隐藏着什么实在的东西。

恩格斯：《致约·魏德迈（1864年1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29—430页

拉萨尔走上这条错误的道路，因为他是米凯尔先生式的“现实政治家”，只是派头更大、目标更高罢了！（顺便说说，我早已看透了米凯尔，因此我认为，他的出场，是由于民族联盟对一个小小的汉诺威律师来说是可以在德国、在自己的小天地以外扬名的良好手段，这样提高了自己的“现实性”，反过来又会使他在汉诺威城内得到公认，并在“普鲁士的”保护下扮演“汉诺威的”米拉波。）正如米凯尔和他现在的朋友们抓住了普鲁士摄政王所宣布的“新纪元”，以便加入民族联盟并依附于“普鲁士的领导地位”一样，正如他们通常在普鲁士的保护下发展自己的“公民自豪感”一样，拉萨尔想在乌凯马尔克的菲利浦二世的面前扮演无产阶级的波扎侯爵，而让俾斯麦扮演他和普鲁士王权之间的撮合者。他只是仿效民族联盟中的先生们而已。不过，那些人是为了中等阶级的利益而引起了普鲁士的“反动”，而他则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同俾斯麦握手言欢。那些先生们这样做要比拉萨尔更有根据，因为资产者习惯于把眼前的利益看做“现实”，而且这个阶级实际上

波扎侯爵和非利浦二世是席勒的《唐·卡洛斯》一剧中的人物，“乌凯马尔克的菲利浦二世”暗指威廉一世。——编者注

甚至到处都和封建主义妥协，可是工人阶级按本性来说应当是真正“革命的”。

对拉萨尔这样一个装腔作势、爱好虚荣的人物来说（但是，他不是用市长等官职这样的小恩小惠可以收买的），一个想法非常使他神往：为无产阶级建立了直接功勋的是斐迪南·拉萨尔！他对这种功勋的现实的条件的确大无知，甚至不能批判地对待自己！另一方面，由于曾经使德国资产者容忍了 1849—1859 年的反动并对愚民措施采取旁观态度的那个卑鄙的“现实政策”，德国工人竟“堕落”到这种地步，以致对这位答应帮助他们一跃而进入天国的自吹自擂的救主表示欢迎！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5 年 2 月 23 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53—354 页

论巴枯宁

巴枯宁有他自己的理论，这种理论是由共产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某种混合物构成的；他想把这两种理论合而为一，这说明他对政治经济学完全无知。另外，他从蒲鲁东那里借用了关于无政府主义是社会最终状态的词句，同时他反对工人阶级的任何政治行动，因为这种行动似乎就是承认现存的政治状况，此外还因为一切政治行动，按照他的意见，都是“权威的”。至于他希望怎样消灭现存的政治压迫和资本的暴虐，他打算如何不用“权威的行动”来实现自己最喜爱的关于废除继承权的思想，他没有说明。在被武力镇压的1870年9月里昂起义期间，巴枯宁在市政厅下令废除国家，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对付国民自卫军中的一切资产者，后者便非常从容地开进市政厅，赶走了巴枯宁，不到一小时的工夫就恢复了国家。不管怎样，巴枯宁在自己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宗派，参加这个宗派的有一小部分法国和瑞士的工人，有许多我们在西班牙的人，有意大利的某些人，……

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1871年7月1—3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41页

巴枯宁一直到1868年都是阴谋反对国际的，他在伯尔尼和平代表大会上遭到惨败之后，加入了国际，并且立刻就开始在国际内部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活动。巴枯宁有一种独特的理论——蒲鲁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物，其中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他认为应当消除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就是说，不是由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对立，而是国家。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都和我们抱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为维护其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而巴枯宁却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那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而我们的说法恰巧相反：废除了资本，即废除了少数人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就会自行垮台。差别是本质性的：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现社会变革，这是荒谬的；废除资本是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对全部生产方式的改造。但是，在巴枯宁看来，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就不应当做出任何事情来维持国家的生命，即任何一种国家——不管是共和国，君主国等等——的生命。因此就应当完全放弃一切政治。进行政治活动，尤其是参加选举，那是背叛原则的。应当进行宣传，咒骂国家，组织起来，而当一切工人即大多数人都站到自己方面来了的时候，就撤销一切政权机关，废除国家，而代之以国际的组织。千年王国由以开始的这一伟大行动，就叫做社会清算。

这一切听起来都异常激进，而且简单得五分钟就能背熟，因此，巴枯宁的这套理论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很快就受到了青年律师、医生以及其他空论家们的欢迎。但是，工人群众决不会让人叫自己相信：他们国内的公共的事情并不同时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按本性来说是有政治头脑的；任何要他们放弃政治的人都终究会被他们所唾弃。向工人宣传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放弃政治，这就等于把他们推到传教士或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怀抱里去。

巴枯宁（1814—1876年），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在第一国际年进行阴谋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上被开除出国际。——编者注

根据巴枯宁的意见，既然国际的建立并不是为了进行政治斗争，而是为了在进行社会清算时能够立即代替旧的国家组织，所以国际应当尽可能地接近巴枯宁的未来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中首先是不存在任何权威，因为权威 = 国家 = 绝对的祸害。（没有一个做最后决定的意志，没有统一的领导，人们究竟怎样开动工厂，管理铁路，驾驶轮船，这一点他们当然没有告诉我们。）多数对少数的权威也将终止。每一个人、每一个乡镇，都是自治的；但是，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又闭口不谈。

所以，国际也应当照这个样子来建立。每一个支部都是自治的，每一个支部中的每一个人也是自治的。巴塞尔决议真该死，它竟授予总委员会以一种危险的和可以败坏它自己的权威！即使这种权威是自愿授予的，它也必须终止，就是因为它是权威！

整个骗局的主要点扼要说来就是如此，但是究竟谁是巴塞尔决议的首倡者呢？正是巴枯宁先生自己及其同伙！

恩格斯，《致泰·库诺（1872年1月24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0—401页

巴枯宁加入国际总共只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他是一个新会员。在和平和自由同盟伯尔尼代表大会（1868年9月）上（他是这个为同无产阶级国际相对抗而创立的国际资产阶级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巴枯宁扮演了一个他最喜爱的江湖骗子的角色；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决议案，这些决议案本身是荒谬的，其目的是以夸张的激进主义激起资产阶级蠢货们的恐惧。由于这个缘故，当他遭到大多数人的否决时，他吵吵嚷嚷地退出了同盟，并煞有介事地在欧洲报刊上宣布了这一巨大事件。他几乎同维克多·雨果一样是一个吹牛专家，用海涅的话来说，雨果不仅仅是利己主义者，而且是雨果主义者。

于是巴枯宁加入了我们的协会，加入了协会的日内瓦罗曼语区分部。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策划阴谋。他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团体的纲领无非是巴枯宁向和平同盟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些决议案。这个团体是作为一个宗派创立起来的，其主要中心在日内瓦，它是一个有自己的代表大会的国际组织，它既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联合组织而存在，同时又是我们的国际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总之，我们的协会由于这个钻进来的秘密团体而势必会逐渐变成俄国人巴枯宁的工具。建立这个新团体的借口是为了达到一个所谓的专门目的——“进行理论宣传”。如果考虑到巴枯宁及其信徒在理论上的极端无知，会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但是巴枯宁的纲领就是“理论”。它实际上包含三点：

（1）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要求——废除继承权，这是圣西门派的旧废物，骗子手和无知之徒巴枯宁充当了这种废物的责任出版者。十分明显，如果有可能通过全民投票在一天之内完成社会革命，那么地产和资本马上会被废除，因而也就根本没有必要研究继承权。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当然，设想有这种可能性是荒谬的），那末宣布废除继承权就不是一个严肃的举动，而是一种愚蠢的威胁，这种威胁会使全体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团结在反动派周围。请设想一下，比如美国佬未能用武力废除奴隶制。那末，宣布废除奴隶继承权是多么愚蠢的行为！这种理论完全是以陈旧的唯心主义观

点为依据的，这种观点认为现在的法学是我们经济制度的基础，而不是把我们的经济制度看作我们法学的基础和根源！至于巴枯宁，他只是想炮制他自己的纲领。如此而已。这是一个极罕见的纲领。

（2）“各阶级的平等”。一方面要保留现存的阶级，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阶级的成员平等——这种不可容忍的荒谬见解一下子就表明这个家伙的可耻的无知和浅薄，而他却认为自己的“特殊使命”是在“理论”上开导我们。

（3）工人阶级不应当从事政治。它的任务只是在工联中组织起来。而工联借助于国际总有一天会取代所有现存国家的地位。你看，他把我的学说变成了什么样的讽刺画！既然把现存的国家改造成合作社是我们的最终目的，那末我们就应当允许政府，即统治阶级的这些庞大的工联做它们认为应当做的一切事情，因为如果我们同他们打交道，那就是说我们承认它们。原来如此！旧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也正是这样说的：你们不应当研究工资问题，因为你们想消灭雇佣劳动，而为着提高工资水平去同资本家作斗争就意味着承认雇佣劳动制度！这头蠢驴甚至不了解，一切阶级运动本身必然是而且从来就是政治运动。

先知巴枯宁，这个没有可兰经的先知的全部理论知识就是这样。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1870年4月19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3—385页

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9月）以后不久，和平同盟在伯尔尼召开了代表大会。这一次巴枯宁以挑拨者的姿态出现，而且——我顺便提一下——是用乐观主义的俄国佬通常为了掩饰自己的野蛮而向西方文明进攻时所用的那种口吻来痛斥西欧资产阶级。他提出一系列决议案，这些决议案本身是荒谬的，其用意是要使资产阶级的傻瓜们感到恐怖，而且使巴枯宁先生能够大叫大嚷地退出和平同盟并加入国际。只要说说以下情况就够了：他向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包含着象“阶级平等”、“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开始”这样一些谬论，以及与此类似的无稽之谈和一大堆唬人的胡言乱语，总而言之，是一个仅仅为着追求短暂功效的庸俗的即兴作品。巴枯宁在巴黎的朋友（一个俄国人在那里参加《实证论者评论》的出版工作）和在伦敦的朋友象宣布一个事变那样向全世界宣布巴枯宁退出和平同盟，并且宣称他的滑稽可笑的纲领——这个由陈腐的老生常谈拼凑起来的杂拌——是某种非常惊人的和独出心裁的东西。

就在那时候，巴枯宁加入了国际的罗曼语区分部（在日内瓦）。他费了几年的时间才下定决心走这一步。但是不消几天工夫，巴枯宁先生就决定要完成国际中的变革并把它变为自己的工具。

巴枯宁背着伦敦总委员会——它在看起来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才得到通知——建立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团体的纲领就是他曾经向和平同盟的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个纲领。因此，这个团体一开始就自称是宣传巴枯宁特有的深奥哲理的“宣传团体”，而巴枯宁本人，社会理论领域中一个最无知的人，在这里突然以一个宗派的奠基者的姿态出现。但是，这个“同盟”的理论纲领只不过是一种无耻的把戏。问题的实质在于它的实际组织，也就是说，这个团体应当是一个在日内瓦设有中央委员会的，即受巴枯宁亲自领导的国际性的团体。但同时它又是国际工人协会的

“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它的分部应当有代表出席国际的“应届代表大会”（在巴塞尔），另一方面，此外还同时举行自己的代表大会，单独地开会，等等。

马克思：《机密通知》（1870年3月28日左右）。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3—304页

1868年底俄国人巴枯宁参加了国际，目的是要在国际内部建立一个以他为首领的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第二个国际。他这个没有任何理论知识的人妄图在这个特殊组织中代表国际进行科学的宣传，并把这种宣传变成国际内部的这个第二个国际的专职。

他的纲领是东一点西一点地草率拼凑起来的杂拌——**阶级平等**（！），以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运动的起点（圣西门主义者的胡说），以无神论作为会员必须遵守的信条，等等，而以放弃政治运动作为主要信条（蒲鲁东主义的）。

这种童话在工人运动的现实条件还不大发展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曾经受到欢迎（现在也还受到一定的支持），在瑞士罗曼语区和比利时的一些爱好虚荣的、沽名钓誉的空论家中间也受到欢迎。

对巴枯宁先生来说，学说（从蒲鲁东、圣西门等人那里乞取而拼凑成的废话）过去和现在都是次要的东西——仅仅是抬高他个人的手段。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于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

马克思：《致费·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396页

论杜林

……我现在能够理解杜林先生的评论中的那种异常困窘的语调了。一般说来，这是一个极为傲慢无礼的家伙，他俨然以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者自居，他做了一件具有两重性的事情。首先，他出版过一本（以凯里的观点为出发点）《国民经济学批判基础》（约五百页），和一本新《自然辩证法》（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我的书在这两方面都把他埋葬了。他是由于憎恨罗雪尔等等才来评论我的书的。此外，他在进行欺骗，这一半是出自本意，一半是由于无知。他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至于说到李嘉图，那末使杜林先生感到伤心的，正是在我的论述中没有凯里以及他以前的成百人曾用来反对李嘉图的那些弱点。因此，他恶意地企图把李嘉图的局限性强加到我身上。但是，我不在乎这些。我应当感谢这个人，因为他毕竟是谈论我的书的第一个专家……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3月6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5—366页

“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如在现代国家里，假定每一个公民对于他所要表决的一切问题具有判断能力一样，正如在经济学中，假定每一个消费者对于他所要买来以供日用的所有商品都是真正的内行一样，——现在科学上认为也要遵守这样的假定。所谓科学的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东西，而这被冒充是唯一严格的科学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假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假科学，现在在德国很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

恩格斯：《〈反杜林论〉三版序言》（1878年6月

1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47

页

总而言之，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现实哲学归根到底正是“德国的所谓启蒙学说的最稀薄的清汤”，它的稀薄和一眼就能看透的平淡无奇只是由于搅拌了神谕式的只言片语，才变得稠厚和混浊起来。当我们读完全书的时候，我们懂得的东西还是和以前的完全一样，而且不得不承认，“新的思维方式”、“彻底独创的结论和观点”和“创造体系的思想”的确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各种新的无稽之谈，可是没有一行字能够使我们学到一些东西。这个人用吹号打鼓来吹嘘自己的手工艺和商品，不亚于最鄙俗的市场叫卖者，而在他的那些

杜林（1833—1921年），曾任柏林大学讲师。德国折衷主义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之一。——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杜林的《哲学教程》。——编者注

大字眼后面却是空空如也，一无所有——这个人竟敢把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这样的人叫做江湖骗子，他们当中最渺小的人和杜林先生比起来也还是巨人。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4—185页

我们分析了杜林的政治经济学的“自造的体系”，最终得到些什么结果呢？只有这样一个事实：在一切豪言壮语和更加伟大的诺言之后，我们也象在“哲学”上一样受了骗。在价值论——“经济学体系的纯洁性的试金石”——上所得出的事实是：杜林先生把价值理解为五种完全不同的、彼此直接矛盾的东西，所以最多也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如此大吹大擂地来宣告的“一切经济的自然规律”，全都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往往甚至是理解得不正确的、最坏的一种老生常谈。自造的体系对于经济事实的唯一解释，是说这些事实是“暴力”的结果，这是几千年来一切国家的庸人在遭遇到一切不幸时聊以自慰的词句，在读了这些以后，我们丝毫没有比未读以前多知道一些。杜林先生不去考察这种暴力的起源和作用，而只叫我们感恩戴德地安于“暴力”这个宁眼，把它当作一切经济现象的终极原因和最后说明。他被迫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对劳动的剥削，他最先把这一剥削一般他说成是以课税和加价为基础，在这里他完全窃取了蒲鲁东的“预征论”（prelevement），以便以后用马克思关于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的理论来具体地解释这种剥削。这样，他一口气就把二者都抄袭下来，结果幸运地把两个完全矛盾的观念调和了起来。他在哲学上总觉得对黑格尔骂得不够痛快，但同时又不断剽窃黑格尔的思想并且使之庸俗化，同样，在《批判史》上对马克思的无限毁谤，也只是为了遮掩这一事实：在《教程》中关于资本和劳动的一切稍微合理的东西，同样是对马克思的庸俗化了的剽窃。在《教程》中，把“大土地所有者”放在文明民族的历史的开端，而对于真正是全部历史出发点的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则一无所知，——这种在今天看来几乎是不可理解的无知，差不多更被《批判史》上以“历史眼光的普遍远大”而自诩的无知所超越，关于这种无知，我们在上面只举出几个惊人的例子。一句话：在开始的时候，由于自我吹嘘、大吹人擂、许下一个胜似一个的诺言而付出巨大的“耗费”，而“成果”却——等于零。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5—296页

杜林先生登上舞台，要从他的至高无上的头脑中，从他的孕育着“最后真理”的理性中，构思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标准”体系，而不根据现有的历史地发展起来的材料，作为这些材料的必然结果来阐述这个体系，那末，到处去嗅模仿者的杜林先生本人只不过是空想主义者的模仿者，最新的空想主义者。他把伟大的空想主义者称为“社会炼金术上”。就算是这样吧，炼金术在当时还是必要的。但是从那时以来，大工业已经把潜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发展为强烈的对立，以致这种生产方式的日益迫近的崩溃可以说是可以用手触摸到了；只有采用同生产力的现在这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

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力本身才能保存和往前发展；由以往的生产方式所造成并在日益尖锐的对立中不断再生产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遍于一切文明国家并且日益剧烈；而且人们也已经了解这种历史的联系，了解由于这种联系而成为必然的社会改造的条件，了解同样由这种联系所决定的这种改造的基本特征。如果说，杜林先生现在不是从现有的经济材料而是从自己的至高无上的脑袋中制造出一种新的空想的社会制度，那末，他就不仅仅是在从事简单的“社会炼金术”了。他的行为倒象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在现代化学的规律被发现和确立以后，还想恢复旧的炼金术，并且所以要利用原子量、分子式、原子价、结晶学、光谱分析，唯一的是为了要发现——哲人之石。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6—307页

让我们同我们这个肯定常常是枯燥无味的和令人气闷的题目和和气和地、高高兴兴地告别吧，在我们不得不讨论各个争论之点的时候，我们的判断总是和客观的无可置疑的事实相联系的；根据这些事实得出的结论，常常不免是尖锐的、甚至无情的。现在，当我们谈完哲学、经济学以及共同社会的时候，当我们不得不逐点地去批判的这位作者的总的形象已经呈现于我们眼前的时候，可以把从他的为人这方面的考虑提到首位来了；现在我们可以把他的许多本来无法理解的科学上的谬误和武断归结为个人的原因，而把我们对杜林先生的全部判断总括为一句话：无责任能力来自旁大狂。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4页

杜林也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甚至提议在他的“共同社会的”制度里禁止宗教。尽管这样，恩格斯完全正确地指出，杜林的“体系”如果没有宗教便不能自圆其说。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234页

为什么恩格斯在这里要讲到这些“陈词滥调”呢？因为他是要驳斥和嘲笑不善于在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问题上应用辩证法的、独断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杜林。当一个唯物主义者，就要承认感官给我们揭示的客观真理。承认客观的即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真理，也就是这样或那样地承认绝对真理。正是这个“这样或那样”，就把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杜林同辩证唯物主义者恩格斯区别开来了。在一般科学、特别是历史科学的最复杂的问题上，杜林到处滥用最后真理、终极真理、永恒真理这些字眼。恩格斯嘲笑他，并且回答说：当然，永恒真理是有的，但是在简单的事物上用大字眼（gewaltige Worte）是不聪明的。为了向前推进唯物主义，必须停止对“永恒真理”这个字眼的庸俗的玩弄，必须善于辩证地提出和解决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问题。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131—132页

论倍倍尔

他是德国（可以说是“欧洲”）工人阶级中罕见的人物。

马克思：《致恩格斯（1882年9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92页

你说倍倍尔在夏天看望过你，我听了很高兴。你对他的看法同我完全一样。他是整个德国党内头脑最清楚的人，而且绝对可靠，从不茫然失措。特别难得的是：他那杰出的演说家的才能是一切市侩都公认的，而且是心悦诚服的，甚至俾斯麦都曾对他的造纸厂合伙人贝伦斯说过，倍倍尔是整个国会中独一无二的演说家，可是这个才能丝毫没有使他变得浅薄。这是从狄摩西尼以来未曾有过的。所有其他的演说家都是浅薄的。

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1884年10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18页

奥古斯特·倍倍尔本身是工人，他通过顽强的斗争使自己树立了社会主义世界观，他把自己全部充沛的精力毫无保留地用来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服务，数十年来他一直同日益成长和壮大的德国无产阶级携手并进，他成了欧洲最有才干的国会议员，最有天才的组织家和策略家，成了国际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运动中最有威信的领袖。

列宁：《奥古斯特·倍倍尔》（1913年8月8日）。
《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1页

新的机会主义思潮在工人运动的官僚中和在知识分子中找到了很多拥护者。

倍倍尔拿出全副精力来反对这种思潮，他表达了工人群众的情绪和他们一定要为实现不折不扣的口号而斗争的坚强信心。他在汉诺威和德勒斯顿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演说，在很长时期内成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为工人政党的真正社会主义性质而斗争的典范。准备和集合工人阶级力量的时期，是各国在发展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事业中所必经的阶段。没有一个人象奥古斯特·倍倍尔那样明显地体现出这个时期的特点和任务。他本身是工人，他能够树立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他能够成为工人领袖的典范，他能够成为资本的雇佣奴隶为争取人类社会最美好的制度所进行的群众斗争中的代表人物和参加者的典范。

列宁：《奥古斯特·倍倍尔》（1913年8月8日）。
《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5—296页

倍倍尔，奥古斯特（1840—1913年），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职业是施工；1867年起领导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第一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在他活动的后期犯过中派性质的错误。——编者注

指借倍尔。——编者注

借倍尔具有杰出的理论才能，但党的实际工作只能让他在运用理论到实际活动中去这方面表现他的这种优良素质。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89年10月17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83页

论威廉·李卜克内西

李卜克内西使我十分愉快。这真是幸运，他还保留了不少南德意志联邦的观点，所以他才能抱着非常明确的目的，并且以无比的义愤来反对俾斯麦的制度，比较带有批判性的辩证的观点，只会在他头脑中引起混乱，使他困惑不解。他显然模仿了鲁普斯在法兰克福议会中的行为，并且也光荣地赢得了要他遵守秩序的叫喊，因为他把国会骂作是赤裸裸的专制主义的遮盖布。你当然已经读到，他在关于联合的法律中加进了保护童工的一段文字。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7年10月22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76页

关于李卜克内西，你谈的那些话，大概是你老早的意见了吧。我们认识他已经多年了。对他来说，受人欢迎是生存的条件。因此，他不得不用调和和粉饰的办法来延迟危机。加之他按其本性来说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把一切事情都看得很美妙。这种情况使他生气勃勃，这是他受人欢迎的主要原因，不过这里也有他的阴暗面。在我和他一个人通信的时候，他不仅把一切消息以他惯用的美妙口吻加以渲染，而且把一切不愉快的事情向我们隐瞒起来，而对我们的询问却回答得那样轻率和马虎，总是令人非常恼火：他竟把我们当成可以任意捉弄的傻瓜！同时，他那种孜孜不倦的进取精神，对日常的鼓动工作无疑是很有好处的，然而在这里却给我们增添了大量无谓的笔墨；他那永无休止的空洞方案加重了别人的工作负担。简单说来，你也明白，在这种情况下，要象我多年来同你和伯恩施但那样，进行一种真正工作上的通信，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就出现了永无休止的争论，为此他和我开过玩笑，赐给我一个光荣称号——欧洲第一号粗暴汉。我给他的信确实常常是粗暴的，但这种粗暴也是由他信中的内容造成的。这一点，谁都没有马克思知道得更清楚。

其次，具有许多可贵品质的李卜克内西，还是一个天生的学校教师。如果一个工人议员在国会里把“第四格的我字”说成“第三格的我字”，或者把拉丁语的短母音说成长母音，而遭到资产者嘲笑的话，他就会灰心丧气。因此，他在国会里就需要象饭桶菲勒克那样的“有教养的人”，但是这帮人在国会中只要发表一篇演说，就会比两千个不合语法的“第三格的我字”给我们造成更大的损害。此外，他还不善于等待。在他看来，立刻取得成就，比世上一切都重要，即使为此牺牲将来重大得多的成就，也在所不惜。你们在弗里茨舍和菲勒克之后到美国去，一定会在那里体会到这一点。当时把他们派到那里去，如同跟拉萨尔派过早实行合并一样，都是失策的；因为半年之后，这些拉萨尔派自己就会去找你们，——不过是作为一帮瓦解的人，摆脱了声誉扫地的头头而去找你们。

李卜克内西，威廉（1826—1900年），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一国际会员，曾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进行反对拉萨尔主义、捍卫国际的原则的斗争，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1869—1876年）和《前进报》编辑（1876—1878年和1890—1900年）；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在某些问题上对待机会主义采取调和主义立场；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编者注

你知道，我同你谈的是由衷之言，是十分坦率的。但是我也认为，你如能对李卜克内西的花言巧语给以坚决的反击，那就做了一件好事。那时，他大概就会让步。如果把抉择真正摆在他的面前，他无疑会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这一点他宁可明天做，而不在今天做，而且最好不是明天做，而是过了一年以后做。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33年5月10—11日）》。

《马克思恩格斯生集》第36卷第24—25页

李卜克内西在说话的时候，总是相信自己的话有道理，可是一同别的什么人说话，又相信别的了。他一会儿十分革命，一会儿十分谨慎。这不会妨碍他在决定性的日子同我们站在一起，并且对我们说：我一向就是对你们这样说的！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85年5月19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15页

纲领中这些含糊和混乱的词句是从哪里来的，你感到奇怪。其实，所有这些词句正是李卜克内西的化身。为此，我们跟他已争论了多年，他对这些词句非常欣赏。他在理论问题上从来是含糊不清的，而我们的尖锐措词直到今天还使他感到恐惧。可是，他作为人民党的前党员，至今仍然喜欢那些包罗万象而又空洞无物的响亮词句。过去，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由于不善于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措词含糊地把工人阶级的解放说成“劳动的解放”，甚至国际的文件有些地方也不得不使用文件对象的语言，这就成了李卜克内西强使德国党沿用陈旧用语的充足根据。绝对不能说他这是“违背自己的见解”，因为他确实也没有更多的见解，而且他现在是否就不处于这种状态，我也没有把握。总之，他至今还常常使用那些陈旧的含糊不清的术语，——自然，这种术语用来夸夸其谈倒是方便得多。由于他确认他自以为十分通晓的基本民主要求至少象他不完全懂得的经济学原理同样重要，所以，他的确真诚地相信：他同意接受拉萨尔信条，以换取基本民主要求，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91年5月1—2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84页

论拉法格

保尔的“善良的上帝”和他的讲稿的导言一样，好极了。对他的听众来说，叙述得也是极其引人入胜的，我倒并不因为他的成就而惊奇。不过，除了那段从李比希那儿弄来的关于征兵身高的

旧引文以外，他本来能够不时地从《资本论》中向他们提供新的例证，并且也不必谈到（1）竞争和（2）供求（这不过又把竞争讲一遍）。如果说我对他要求严格，那只是因为我认为这对他有好处，因为不时地给予一些严肃批评，他就会显著的进步；他最近的一些表现确实证明他大有进展。只要他更加注意一些理论上的问题（主要是对一些细节），那他就会成为巴黎这个光明之城的一盏明灯。

恩格斯：《致劳·拉法格（1886年2月2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17—118页

保尔登在《新时代》上的文章整个说来很好，其中对历史事件的某些评价是值得赞扬的。对法国1871年以后的历史的因果联系的揭示和对这段历史进程的阐述，是我读过的东西中写得最好的；我从中吸取了很多东西。

恩格斯，《致劳·拉法格（1894年9月下半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86页

邮包把我埋住了。但我还是把您的书看完了。全书文笔漂亮，历史事例非常鲜明，见解正确并有独到之处，而最大的优点是，它不象德国教授写的书那样：正确的见解不是独到的，独到的见解却不正确。主要的缺点是您似乎结束得太仓促了；这本书的文字，尤其是关于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的那几章，可以更严谨些，特别是考虑到巴黎的读者习惯于轻松读物，甚至是适合于懒惰读者的轻松读物；“巴黎人”也是坚持自己的懒惰权的。不少很好的段落可能失去一部分效果，因为它们好象被放在括弧里一样，要么就是因为您过多地让读者自己去作结论和总结。

至于内容本身，我主要对氏族共产主义一章有不同意见。……

这是个还需要好好研究的问题。我从您那里了解到法国的氏族共产主义的这种独特性质，既然您全心全意埋头于此，那您就只有把这一很有希望的研究继续下去。

拉法格，保尔（1842—1911年），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政论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西班牙通讯书记（1866—1869年），曾参加建立国际在法国的支部（1869—1870年），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支部（1871—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代表，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1879年）；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组织者之一和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的丈夫。——编者注

指专门阐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讲座。这个讲座是由法国工人党社会主义图书馆所属的一个小组举办的，自1884年1月23日起每个星期日由拉法格和杰维尔宣讲，并将讲稿在报上发表。恩格斯所说的“善良的上帝”，指的是拉法格在第一讲《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中对唯心主义世界观进行的驳斥。——编者注

指保·拉法格《法兰西阶级斗争》。——编者注

指保尔·拉法格的著作《财产的起源与发展》。——编者注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95年4月3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34—435页

论梅林

前几天我得到了一本梅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三版，我看了一下历史部分。他在《资本和报刊》一书中，由于一件有名的怪事实现了他的转变，当然是有些轻率。但这使我们很满意；我们没有什么要责备他的，而他本人对自己是否会有什么要责备的，那是他的事，与我们无关。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就会公开声明我的立场的转变；这丝毫没有有什么可耻的，而且可以避免很多纠纷，避免气恼和浪费时间。不管怎样，他如果真的要脱离政治，那是荒谬的；他这样做只能为当权者和资产阶级帮忙。他为《新时代》撰写的社论确实是十分精彩的，我们每次都以迫不及待的心情等待这些社论。绝不能让这样一支犀利的笔销声匿迹，或者浪费在对一些鄙俗的小说家的批评上。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92年3月8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97页

我从您发表在《新时代》上的文章中的一些引证和对过去的回顾清楚地看到，您对1848年以前的时期有很透彻的研究。由您担任对德国历史的这个时期以及此后时期的研究工作，我很高兴。

恩格斯：《致弗·梅林（1895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54页

梅林不仅是一个愿意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而且是一个善于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363页

弗·梅林在他的《与左尔格通信集》中，力图缓和马克思以及后来恩格斯对于机会主义者的抨击，我们认为他的这种努力未免有点过分。例如，在谈到赫希柏格之流的时候，梅林总是固执己见，认为马克思对于拉萨尔和拉萨尔派的评价不正确。但是我们再说一遍，这里我们认为重要的，并不是从历史上评价马克思对于某些所谓社会党人的抨击是否正确或者是否过分，而是马克思对于一般社会主义运动中某些派别所作的原则性的评价。

列宁：《〈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4月6日）。《列宁选集》第1卷第696—697页

梅林，弗兰茨（1846—1919年），杰出的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八十年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写有许多关于德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的著作，《马克思传》的作者；《新时代》杂志编辑之一；德国社全民主党左翼领袖和理论家之一；在创建德国共产党时起过卓越的作用。——编者注
指梅林。——编者注

论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

这派最有名的代表，在德国是“斯巴达克派”或“国际派”，卡尔·李卜克内西就是它的成员之一。卡尔·李卜克内西是这一派别和真正无产阶级的新国际的最有名的代表。

卡尔·李卜克内西号召德国的工人和士兵把枪口转向本国政府。卡尔·李卜克内西曾在国会的讲台上公开发出这一号召。后来，他又到柏林一个最大的广场——波茨坦广场上，向示威群众散发秘密印出的传单，号召“打倒政府”。他因此被逮捕并被判处苦役。他现在被关在德国的苦役监狱里。在德国有几百个甚至几千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都因反对战争而被监禁起来。

卡尔·李卜克内西在他的演说和信件中，不仅同本国的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之流（即谢德曼、列金、大卫之流）作无情的斗争，而且同本国的中派即同本国的齐赫泽、策烈铁里之流（即考茨基、哈阿兹、累德堡之流）作无情的斗争。

在一百一十个议员中，只有卡尔·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奥托·吕勒两个人破坏了纪律，破坏了同“中派”和沙文主义者的“统一”，反对全体议员。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人代表社会主义，代表无产阶级事业，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此外，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正象罗莎·卢森堡（她也是“斯巴达克派”的成员和领袖之一）正确地形容的那样，已变成了奥尸。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4月10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55—56页

有人对我们说：“在许多国家中，一切处于睡眠状态。在德国，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拥护战争，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人反对战争。”我回答说：这一个李卜克内西代表着整个工人阶级，全国人民的希望正是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寄托在拥护他的人们身上，寄托在德国无产阶级身上。你们不相信吗？你们就继续进行战争吧！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你们不相信李卜克内西，不相信工人革命，不相信革命正在成熟，你们就相信资本家吧！

列宁：《战争与革命》（1917年5月14日[27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91—92页

李卜克内西是各国工人都知道的名字。在任何地方，特别是在协约国，这个名字象征着一个领袖对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革命无限忠诚，象征着真诚地不惜一切牺牲地去同资本主义作无情的斗争，象征着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同帝国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而且正是在帝国主义的胜利把“自己的”国家弄得乌烟瘴气的时候，不惜一切牺牲地去进行这种斗争。德国社会主义者中一切忠实的真正革命的人，无产阶级中一切优秀的坚定的人，一切义愤填膺和日益具有革命决心的被剥削群众，都是同李卜克内西和“斯巴

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年），德国和国际工人革命运动的卓越活动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19年1月与卢森堡一起被反动政府杀害。——编者注

罗莎·卢森堡（1871—1919年），德国和波兰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和第二国际左派代表之一，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编者注

达克派”一起前进的。

列宁：《给欧美工人的信》（1919年1月21日）。

《列宁全集》第28卷第410页

这一时期的群众性革命斗争创造了世界史上前所未见的组织，例如工人代表苏维埃，以及随之而起的士兵代表苏维埃、农民委员会等等。可见，现在全世界觉悟工人所注意的那些基本问题（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在1905年年底就实际地提出来了。象罗莎·卢森堡那样的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马上就看出了这个实际经验的重要意义，在会议上和刊物上批判地分析了这个经验，可是，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绝大多数正式代表，其中包括改良主义者和后来的“考茨基分子”、“龙格分子”以及美国的希尔奎特的信徒之类的人，却表现出完全不能了解这个经验的意义，完全不能尽到革命家所担负的研究和宣传这个经验的教训的责任。

列宁：《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1920年10月20日）。

《列宁全集》第31卷第306—307页

他的错误只在于夸大了这个真理，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进行具体分析的要求，把对这次战争的估计搬到帝国主义时代可能发生的一切战争上去，忘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为“再也不会民族战争”这个论点辩护的唯一理由是：世界已经被少数帝国主义“大”国瓜分完了，因此任何战争，即使起初是民族战争，以后也会由于触犯帝国主义列强或联盟之一的利益而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

这个理由显然是不正确的。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以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反之亦然。例如，法国大革命的战争起初是民族战争，而且也确实是这样的战争。这些战争都是革命的：保卫伟大的革命，反对反革命君主国的联盟。但是，当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帝国，奴役欧洲许多早已形成的、有生命力的民族大国的时候，法兰西的民族战争便成了帝国主义战争，而这种帝国主义战争又反过来引起了反对拿破仑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7月）。

《列宁选集》第2卷第849—850页

尤尼乌斯说阶级斗争是反对侵略的最好手段，只是运用了一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正确的道路上走了一步之后，马上又离开了这条道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至于阶级斗争是反对侵略的最好手段的说法，不论对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或对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来说，都是正确的。正因为这对任何阶级压迫来说都是正确的，这过于一般化，所以对这一特殊场合是不够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也是一种阶级斗争，只有这种阶级斗争才会使欧洲（整个欧洲，不是一个国家）避免侵略的危险。……

尤尼乌斯几乎得出了正确的答案和正确的口号：要进行争取社会主义、

指尤尼乌斯，即罗莎·卢森堡。——编者注

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只是他害怕彻底说出全部真理，而在 1914、1915、1916 年向后转了，陷入了“民族战争”的幻想。要是不从理论方面，而纯粹从实践方面来看问题，那尤尼乌斯的错误也是很明显的。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 年 7 月）。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857—858 页

论伯恩斯坦

曾经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斯坦，在十九世纪末采取了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即改良主义的观点。

列宁：《奥古斯特·倍倍尔》（1913年8月8日）。
《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5页

伯恩斯坦依然来信说他想离开《社会民主党人报》，并且建议现在让克格尔参加，然后使之成为他的继任者。我认为任何变动都是有害的。伯恩斯坦出乎意料地如此称职（例如，他的论“知识分子”的文章，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以外，写得很出色，而且采取了完全正确的方针），以致很准找到更合适的人。克格尔在这方面至少还没有经过考验，而情况又是这么摆着：应该避免任何试验。我已力请伯恩斯坦留任，我认为最好由你们来说服他。在他主持之下，报纸愈办愈好，他本人也变得更好了。他具有真正的机智，能迅速领悟，这和考茨基截然不同；后者是一个很不错的青年，但却是一个天生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他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81年8月25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11—212页

他们二人阔，而且敏锐机智。他就是缺乏自信心，这在今天真是少有的现象。在甚至微不足道的笨蛋学者都普遍具有夸大狂的时候，在一定意义上说，这还是个优点。考茨基在几个大学里，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学过，但他正在竭力设法把它们忘掉。他们二人都经得住坦率的批评，正确领会最主要的东西，值得信赖。和那种粘在党身上的糟糕透顶的青年文人相比，这两个人倒是真珠子。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85年6月22—24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32—335页

你认为伯恩斯坦有时轻率从事，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不过在这方面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恩格斯：《致马克思（1882年12月22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31页

修正主义或“修改”马克思主义是目前资产阶级影响无产阶级和腐蚀无产者的主要表现之一，甚至是最主要的表现。正因为如此，机会主义者的领袖爱德华·伯恩斯坦才扬名（臭名）全世界的。

列宁：《图快出丑》（发表于1914年5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322页

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第二个五十年（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一开始

伯恩斯坦，爱德华（1850—193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从改良主义立场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编者注

就是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斗争。

这个派别叫做伯恩施坦派，因为曾经是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施坦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对马克思学说的修订，即修正主义。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899年）。

《列宁选集》第2卷第2页

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所抱的态度，是它的经济倾向和政治倾向的自然补充。“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施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899年）。

《列宁选集》第2卷第7页

论考茨基

脚踏两只船是考茨基一生的命运。他装做在理论上完全不同意机会主义者的样子，其实他在实践上，在一切重大问题（即一切同革命有关的问题）方面都是同意机会主义者的。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649页

认为机会主义是不走“极端”的统一的政党中的“合法派别”的这种旧理论，现在已成为对工人的最大欺骗和对工人运动的最大障碍了。会使自己立刻失去工人群众的公开的机会主义，倒不象这种中庸论那么可怕和有害，因为后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替机会主义的实践辩护，用一连串的诡辩来证明革命行动的不合时宜等等。这个理论的著名代表和第二国际的著名权威考茨基，就是头号伪君子 and 糟蹋马克思主义的能手。在拥有百万党员的德国党内，凡是比较忠诚、比较觉悟和比较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无不愤懑地唾弃这个为休特古姆和谢德曼之流所热烈拥护的“权威”。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6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663页

“中派”专讲小资产阶级的善良空话，口头上是国际主义，实际上是胆怯的机会主义，向社会沙文主义者讨好。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派”不相信用革命来反对本国政府的必要性，不宣传革命，不进行忘我的革命斗争，而捏造各种最卑鄙的——听起来好像是绝顶“马克思主义”的——借口来躲避革命。

社会沙文主义者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是工人运动中的资产者。……

“中派”是被腐朽的合法性侵蚀了的，被议会制度等等环境败坏了的顽固派，是惯于找个安乐窝和“稳当的”工作的官吏。……

“中派”的主要领袖和代表卡尔·考茨基，是第二国际（1889—1914年）中最有威望的人物，是彻底毁坏马克思主义、毫无气节、从1914年8月起就非常可鄙地动摇和叛变的典型。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4月10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54页

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人物，是一个从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弄到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司徒卢威主义”或“布伦坦诺主义”的最

考茨基（1854—193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最早曾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以后堕落为叛徒；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领袖之一。——编者注

司徒卢威主义即“合法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歪曲。彼·别·司徒卢威及其他“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企图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和工人运动来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列宁在自己的著作里揭露了司徒卢威主义是国际机会主义和后来采取伯恩斯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形式的修正主义的萌芽；他指出司徒卢威主义必然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司徒卢威是俄国帝国主义的思想家之一；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掩护，坚持社会沙文主义，并为掠夺战争、兼并和民族压迫作辩护，他的虚假的借口就是“我国的胜利会加速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说，会加速社

典型最鲜明的例子。我们从普列汉诺夫的例子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不承认宣传和准备这种斗争手段并用这种精神教育群众。考茨基把以下两者无原则地“调和起来”：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承认在这次战争中保卫祖国，另一方面是对左派作外交式的表面的让步，如在表决军事拨款时弃权，在口头上承认自己采取反对派立场等等。……

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任务。考茨基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第二国际矛盾的社会产物，是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7—8月）。
《列宁选集》第2卷第680页

对无产阶级的思想独立来说，目前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考茨基的这种丑恶的自鸣得意和卑劣的伪善态度更有害和更危险的了，他想蒙蔽一切和掩盖一切，想用诡辩和似乎是博学的废话来平息工人的已经觉醒了的心。考茨基如果在这一点上能够得逞，那他就会沦为资产阶级破烂在工人运动中的主要代表。

列宁：《给亚·施略普尼柯夫（1914年10月27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152页

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正是目前联合右翼和左翼并以考茨基为正式代表的政党，因为考茨基善于用漂亮的和“纯粹马克思主义的”辞令使宇宙万物调和起来。在口头上，在人民、群众和工人面前，是社会主义和革命性；在事实上，却是休特古姆主义，即在一切严重的危机关头投靠资产阶级。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655页

考茨基的著作译成俄文的无疑比译成其他各国文字的要多得无可计量。难怪有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开玩笑说，在俄国读考茨基著作的人比在德国还多（附带说一说，在这个玩笑里含有比开这个玩笑的人所料想的更深刻得多

会主义的到来”。——编者注

布伦坦诺主义是一种“承认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资产阶级学说”，因路·布伦坦诺而得名。路·布伦坦诺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他企图证明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改良，通过调和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可以实现社会平等的。布伦坦诺和他的追随者以马克思主义词句为幌子，企图使工人运动服从资产阶级的利益。——编者注

休特古姆，阿尔伯特（1871—194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首领之一，修正主义者。1900—1918年是帝国国会议员。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期间是狂热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在殖民地问题上宣扬帝国主义观点，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1918—1920年任普鲁士财政大臣。列宁在一些著作中曾痛斥休特古姆，把他及其信徒称作“德皇和资产阶级的卑鄙走狗”组成的匪帮。“休特古姆”一词已成为刻画极端机会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典型的普通名词。——编者注

的历史内容：俄国工人在 1905 年对世界最优秀的社会民主主义文献中最优秀的著作有空前强烈的要求，他们得到的这些著作的译本也比其他各国多得无可比拟，这样就把比较先进的邻国的丰富经验加速地移植到我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所谓年轻的基地上来了）。

考茨基之所以在俄国特别出名，是因为他除了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通俗的解释以外，还同机会主义者及其首领伯恩斯坦进行了论战。但是有一个事实几乎是没有人知道的。如果有人想考察一下考茨基在 1914—1915 年危机最尖锐时期怎样最可耻地表现出张皇失措，堕落到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地步，那就不能放过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考茨基在起来反对法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米勒兰和饶勒斯）和德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伯恩斯坦）之前，就已经表现出很大的动摇。……

但是另一件事情的意义更重大得多，这就是：当我们研究考茨基最近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经过的时候，从他同机会主义者的论战中，从他提问题和解释问题的方法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国家问题上恰恰是一贯倾向于机会主义的。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 年 8—9 月）。《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261—262 页

既然考茨基作为理论家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我们从考茨基的很多著作中知道，他是能够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虽然他后来成了叛徒，他的那些著作始终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财富。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 年 10—11 月）。《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653 页

运动的浪潮愈高，反动派在反对革命的斗争中就武装得愈卖力、愈坚决。1905 年的俄国革命，证实了卡·考茨基于 1902 年在他的《社会革命》一书中所阐明的观点（顺便说一下，考茨基在那时还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现在社会爱国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辩护人）。

列宁：《关于 1905 年革命的报告》（1917 年 1 月 9 日以前）。《列宁全集》第 23 卷第 255 页

论普列汉诺夫

您征求我对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的意见。为此我得把书看一遍。如果我有一个星期对俄语下一点功夫，我读起来就会相当容易，可是我往往一连半年都找不到这样的机会；于是语言就生疏了，我不得不重新学习。看《意见分歧》一书的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我想，这本书就我所看过的这么一点也足以使我多少知道所谈的意见分歧了。

首先，我再对您说一遍，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有一点泛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

恩格斯：《致维·伊·查苏利奇（1885年4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0—301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是“劳动解放社”即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他们的朋友们的主要功绩。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226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的普列汉诺夫，对伯恩施坦的最时髦的“批判”作了无情的批判，他做得完全正确……

列宁：《我们的纲领》（1899年）。《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

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话，是针对德国激进派说的。他能看到德国人的小错误，却看不到他自己的大错误，这是他的个性。最近十年来，即在普列汉诺夫在理论上是激进主义、在实践上是机会主义的时期，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他的这种特点了。

列宁：《死去的沙文主义和活着的社会主义》（1914年12月12日）。《列宁全集》第21卷第82页

该摘掉假面具了，不然工人也许会不客气地把它扯下来！可怜的普列汉诺夫不知不觉地滚进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小集团，滚进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废墟，这个地方是一片混乱和涣散的状态，是进行派别活动的场所，他们想破坏团结了两年的真理派的数千个工人团体的统一。

普列汉诺夫（1856—1918年），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1903年以后，倾向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编者注

草稿中这里删去了：“你们这一派和民意党人之间的”。——编者注

我们对普列汉诺夫表示惋惜，因为凭他同机会主义者、民粹主义者、马赫主义者以及取消派的斗争本应该得到更好的结果的。

列宁：《不知道自己希望什么的普列汉诺夫》（1914年5月25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311页

德国公开的机会主义者威廉·科尔布的小册子《处在十字路口上的社会民主党》（1915年卡尔斯卢厄版）正好是在普列汉诺夫的文集《战争》出版之后问世的。……

谁想认真思索一下第二国际破产的意义，我们劝他去比较一下科尔布和普列汉诺夫的思想立场。他们两个人（同考茨基一样）在基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反对和讥笑借这次战争的机会采取革命行动的思想；他们两个人都用普列汉诺夫分子爱用的字眼“失败主义”来责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普列汉诺夫把借这次战争的机会进行革命的思想叫作“可笑的空想”，申斥“革命的高调”。科尔布乱骂“革命的空谈”、“革命的幻想”、“激进派（Badikalinski）—歇斯底里病患者”、“宗派主义”等等。科尔布和普列汉诺夫在主要问题上是一致的，他们两个人都反对革命。至于科尔布完全反对革命，而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完全赞成”革命，这不过是色彩上、文字上的差别：实际上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都是科尔布的走狗。

列宁：《威廉·科尔布和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1916年2月29日）。《列宁全集》第22卷第135页

这就是我们对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的权威性的看法。普列汉诺夫的理论著作（主要是批判民粹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仍然是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牢固的成果，任何“派别活动”都不能混淆视听，不能使稍微有些“理智”的人忘记或者否定这些成果的重要性。但是作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领袖，作为一个策略家，普列汉诺夫却经不起任何批判。他在这方面表现的机会主义给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带来的危害性，要比伯恩施坦的机会主义给德国工人带来的危害性大百倍。我们必须向普列汉诺夫这种立宪民主党式的政策展开最无情的斗争，因为他已经回到1899—1900年从社会民主党中清除出去的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之流的怀抱里去了。

列宁：《卡·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的俄译本序言》（1906年12月）。《列宁全集》第11卷第398页

我们仅仅指出，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里大讲特讲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所以必须坚决地着重指出，是因为现在有些人极其错误地企图以批判普列汉诺夫在策略方面的机会主义为幌子来偷运陈腐反动的哲学垃圾。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899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3—4页

我觉得在这里应当附带向年轻的党员指出一点：不研究——正是研究——

—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921年1月25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顺便说一下，不能不希望：第一，把现在正在出版的普列汉诺夫全集中的所有哲学论文汇编成一卷或几卷专集，并且附上详细的索引等等。因为，这种专集应当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第二，我认为工人国家应当对哲学教授提出要求，要他们知道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并且善于把这种知识传授给学生。不过这一切已经是离开“宣传”而转到“行政手段”上面去了。（列宁原注）

论赫拉克利特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

恩格斯：《反社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页

谢谢你的《赫拉克利特》。我对这位哲学家一向很感兴趣，在古代的哲学家中，我认为他仅次于亚里士多德。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7年12月2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27页

拉萨尔在这本著作中完全不知道分寸，他竟把赫拉克利特**淹没在黑格尔那里**。这很可惜。**如果恰如其分地阐述赫拉克利特**，把他作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那是非常有益的：应当把拉萨尔的八百五十页精简成八十五页，并译成俄文：“赫拉克利特是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在拉萨尔看来）。”这样就会成为有用的东西！

列宁：《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0—391页

古代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持着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列宁在谈到这个唯物主义观点时说：“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的说明。”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64年版第636页

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480年），古希腊哲学家，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自发的唯物主义者。——编者注

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编者注
指《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编者注

论德谟克利特

了解德谟克利特哲学所依靠的真正的史料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而不是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几条轶闻；德谟克利特不仅不排斥世界，反而是经验的自然科学家和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几乎无人知道的伦理学只有几条意见，这些意见是一个游历甚广的老年人可能提出来的：他的自然科学著作只是被 Per abusum[牵强附会地]列入哲学的，因为他所谓的原子跟伊壁鸠鲁的不同，他所谓的原子仅仅是物理假设，用以解释事实的辅助工具，这完全象原子在近代化学（道尔顿等）解释化合比例方面所起的作用一样；——所有这一切都不合乡下佬雅各的胃口。德谟克利特一定被“唯一地”理解了，德谟克利特说到“宁静”，也就是说到“精神的安静”，也就是说到“返回自身”，也就是说到“排斥世界”；德谟克利特是一个斯多葛主义者，他和口念《Brahm》（应该说《OM》[“唵”]）的印度头陀的差别不过是象比较级和最高级之间的差别一样，即“只有程度上的”差别。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46页

黑格尔完全象后母那样对待德谟克利特，全部的话都在第378—380页[270 272]上！唯心主义者忍受不了唯物主义的精神！！引述了德谟克利特的话（第379页[272]）：

《依照意见存在着温暖，依靠群众照意见存在着寒冷，依照意见存在着颜色、甜味、苦味；但依照真理则只有不可分的东西和虚空。》（Sextus Empiricus.Adversus Mathematicos 第7篇第135节）

并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样，我们看到，德谟克利特更确定他说出了自在的存在和为他的存在这两个环节的区别》……（第380页）[272]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94页

论苏格拉底、柏拉图在伯利克里时代，诡辩学派、称得上哲学化身的

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370年），古希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编者注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tiefmutterlich——译者注

99900260_275_2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behandelt.——译者注 指《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德文版第13卷的页码。——编者注

指《黑格尔全集》1883年柏林德文版第13卷的页码。 编者注

指《黑格尔全集》1932年俄文版第9卷的页码。——编者注

指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反对数学家》，该书共分十一册，其中六册是批判文法、修辞学、几何学、算术、天文学和音乐的，还有五册（《反对独断论者》）是批判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的。——编者注

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69—399年），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编者注

柏拉图（约公元前427—347年），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拥护者。

苏格拉底、艺术以及修辞学等排斥了宗教。

马克思：《第 179 号〈科伦日报〉社论》（1842 年 6—7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113 页

苏格拉底称自己的方法为助产术（第 64 页 [48]）（据说他母亲传给他的）（（苏格拉底的母亲 = 助产士））——帮助思想产生出来。
很妙！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 年）。《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304 页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工被说成是国家的构成原则，就这一点说，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发表于 1867 年 9 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405—406 页

古典古代对于分工的见解，是和现代的见解形成“最严格的对立”的。——柏拉图把分工描述为城市的（在希腊人看来，城市等于国家）自然基础，这种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描述……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 年 9 月—1878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269 页

——编者注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Hebammenkunst.——译者注

指《黑格尔全集》1833 年柏林德文版第 14 卷的页码。——编者注

指《黑格尔全集》1932 年莫斯科俄文版第 10 卷的页码。——编者注

论亚里士多德

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9页

形式逻辑本身从亚里士多德直到今天都是一个激烈争论的场所。而辩证法直到现在还只被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两个思想家比较精密地研究过。然而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466页

Aristoteles. 《De Anima》 第2篇第5章：

感觉和认识

《区别》（感觉和认识之间的）《就在于：那引起感觉的东西是外在的。其原因是：感觉的活动是针对单一的东西的，相反地，认识则是针对普遍的东西的；而这普遍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是作为实体而存在于灵魂自身中。因此，每个人只要愿意，他自己就能思想……而感觉则是不由他作主的，——要感觉，就必须有被感觉的东西。》（第377页） [286]

亚里士多德紧密地接近唯物主义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8页

通常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和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不同的“实在论”、“经验论”（第299页） [255]，同上第311页^[237]，这个见解是不正确的（（这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古希腊奴隶主阶级的哲学家，辩证论者，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编者注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编者注 指《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德文版第14卷的页码。——编者注 指《黑格尔全集》1932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0卷的页码。——编者注

[255]

，同上第311页^[237]，这个见解是不正确的。（（这里黑格尔显然又把许多东西牵强附会地说成是唯心主义。））注意在叙述亚里士多德同柏拉图的学生们关于注意理念的争论时，黑格尔抹杀它的唯物主义的特征。（参看第322—323页^[244—245]及其他各页。）他失言了：《把亚历山大》（马其顿的亚历（（只要倒转过山大，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奉为神，这是不来》）正是这足为奇的……神和人根本不是如此格格不入的！的）……第（305页）^[231]

[255]

，同上第311页^[237]，这个见解是不正确的。（（这里黑格尔显然又把许多东西牵强附会地说成是唯心主义。））注意在叙述亚里士多德同柏拉图的学生们关于注意理念的争论时，黑格尔抹杀它的唯物主义的特征。（参看第322—323页^[244—245]及其他各页。）他失言了：《把亚历山大》（马其顿的亚历（（只要倒转过山大，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奉为神，这是不来》）正是这足为奇的……神和人根本不是如

里黑格尔显然又把许多东西牵强附会地说成是唯心主义。))
在叙述亚里士多德同柏拉图的学生们关于理念的争论时，黑格尔**抹杀**它的唯物主义的特征。(参看第 322 323 页^[244 245]及其他各页。)

注意 注意

他失言了：《把亚历山大》(马世顿的亚历山大，亚里士多德的学生)……
《奉为神，这是不足为奇的……神和人根本不是如此格格不入的》……第(305 页)^[231]

((只要倒转过来))正是这样！

黑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唯心主义就在他的神的观念中(第 326 页)^[247]
((当然，这是唯心主义，但比起柏拉图的唯心主义来，它客观一些，离得远一些，一般化一些，因而在自然哲学中就比较经常地 = 唯物主义。))

黑格尔把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念的批判完全弄糟了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 年)。《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313 页

黑格尔因亚里士多德的“真正思辨的概念”(第 373 页^[283]关于“灵魂”和其他许多东西)而对他大肆吹捧，并渲染明显的唯心主义的(= 神秘主义的)胡说八道，读到这里实在是令人厌恶。

亚里士多德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动摇的**一切**地方，都被掩饰起来了!!!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 年)。《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317 页

亚里士多德**如此**无力地抬出神来反对唯物主义者留基伯和唯心主义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有折衷主义。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 年)。《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314 页

在《形而上学》的开始部分，最具有特色和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同柏拉图的论战以及因唯心主义的胡说而发生的绝顶天真的“困惑的”问题和怀疑。而所有这一切又在关于基本的东西、即概念和个别东西这个问题上陷入毫无办法的混乱。

注意：《形而上学》这本书在开头的地方**坚决**反对赫拉克利特、反对存在和非存在同一的思想(希腊哲学家们接近这种思想，但他们没有掌握这种思想，没有掌握辩证法)。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处处、到处都显露出辩证法的活的萌芽和探索……

亚里士多德处处都把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混合起来，而且混合得处处都**显出**客观逻辑来，对于认识的客观性没有怀疑。对于理性的力量，对于认识的力量、能力和客观真理性抱着天真的信仰。并且在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即概念与感觉得到的个别对象、事物、现象的实在性的**辩证法**上陷入稚气的混乱状态，陷入毫无办法的困窘的混乱状态。

此格格不入样!的》……第(305 页)^[231]

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形而上学》。——编者注

经院哲学和僧侣主义抓住了亚里士多德学说中僵死的东西，而不是**活生生的东西**：寻求、探索、迷宫，人迷了路。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是寻求、探索，它接近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但是，亚里士多德（他到处，在每一步上所提出的问题**正是关于辩证法**的问题）的逻辑学却被变成僵死的经院哲学，它的一切探索、动摇和提问题的方法都被抛弃。而这些提问题的方法就是希腊人所用的那一套试深方式，就是在亚里士多德学说中卓越地反映出来的质朴的意见分歧。

列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6—417页

论伊壁鸠鲁

伊壁鸠鲁则相反，他是古代真正激进的启蒙者，他公开地攻击古代的宗教，如果说罗马人有过无神论，那末这种无神论就是由伊壁鸠鲁奠定的。因此卢克莱修歌颂伊壁鸠鲁是最先打倒众神和脚端宗教的英雄；因此从普卢塔克直到路德，所有的圣师都把伊壁鸠鲁称为头号无神哲学家，称为猪。也正因为这一点，亚历山大里亚的克雷门才说，当保罗激烈反对哲学时，他所指的只是伊壁鸠鲁的哲学（《地毯集》1688年科伦出版社版第1卷第295页）。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这位公开的无神论者在公然进攻世界的宗教的时候是如何“狡猾、诡谲”和“聪明”地对付世界；而斯多葛派却使古宗教去适应自己的思辨，怀疑论派则是用他们的“假象”概念作为借口，使他们的一切判断都带有 *reservatio* 格不入 *mentalis* [精神上的保留]。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47页

自从物理学和化学又几乎专门从事于分子和原子的研究以来，古希腊的原子论哲学必然地重新出现在最前列。但是它甚至被最优秀的自然科学家处理得何等肤浅呵！例如，凯库勒（《化学的目的和成就》）说，原子论哲学的创始者不是留基伯而是德谟克利特，并且断定，道尔顿最先承认在质上不同的元素原子的存在，并最先认为这些元素原子具有不同的、为不同的元素所特有的重量。可是我们在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43—44和61节）那里就可以读到：伊壁鸠鲁已经认为各种原子不仅在大小上和形态上各不相同，而且在重量上也各不相同，就是说，他已经按照自己的方式知道原子量和原子体积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6—467页

在伊壁鸠鲁看来，灵魂是原子的“某种”集合。《这一点洛克也说过（！！！！）……这都是些空话》……（第488页）[372—373]（（不，这是天才的猜测，是为科学而不是为僧侣主义指示途径的路标。））

这**也是**令人惊奇的！！！！伊壁鸠鲁（公元前341—270），洛克（1632—1704）差别 = 两千年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27页

伊壁鸠鲁（约公元前341—270年），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编者注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 uch.*——译者注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fferenz.*——译者注

论伊里吉纳

同时，在整个欧洲，爱尔兰更以学问的发源地见称，这种见解在当时可说是根深蒂固，查理大帝就曾经请爱尔兰教士阿尔宾到帕维亚去任教，以后又由另一爱尔兰人敦加尔代替了他的职位。在当时起过重要作用、但现在已多半被人遗忘的许多爱尔兰学者中间，最卓越的是被称为“中世纪哲学之父”或被艾尔德曼称为“中世纪哲学的 Carolus Magnus[查理大帝]”的约翰·司各特·伊里吉纳。黑格尔在论及他时这样说：“他是当时第一个开创真正的哲学的人。”在九世纪的西欧人中他是唯一懂得希腊文的，他翻译了被认为是迪奥尼修斯法官的著作，从而重新建立了和古代哲学的最近一代人的联系，和亚历山大里亚新柏拉图学派的联系。他的学说在当时来说是特别大胆的；他否定“永恒的诅咒”，甚至对于魔鬼也如此主张，因而十分接近于泛神论；因此，当时正统思想的代表人物对他就不乏恶意的攻击。直到整整两个世纪之后，伊里吉纳所奠基的科学才有了坎特伯雷的安瑟伦这样一个继承人。

恩格斯：《爱尔兰史——古代的爱尔兰》（1870年5—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63页

伊里吉纳，约翰·司各特（约810—877年），爱尔兰人，中世纪哲学家、神学家和翻译家。——编者注
伊里吉纳的详细学说和著作见艾尔德曼著《哲学史纲》1869年柏林第2版第1卷第241—247页
（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2. Aufl. Berlin, 1869, Bd. I, S. 241—247）。从伊里吉纳（他绝非什么宗教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爱尔兰人所特有的那种灵敏机智。一次，法国国王秃头查理和他隔一张桌子坐着，查理问他，苏格人（scot）和笨蛋（sot）相差多少，伊里吉纳答道：“相差一张桌子那么远。”

论培根、霍布斯、洛克

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以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8页

维鲁拉姆男爵培根把神学的物理学称为献给上帝的永不生育的少女；他把物理学从神学里解放出来，于是物理学就变成一门有成果的科学了。

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1842年6—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7—128页

“

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看来，自然哲学是唯一真正的哲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哲学最主要的部分。阿那克萨哥拉和他的同素体，德莫克利特和他的原子，都常常被他当做权威来引证。在他看来，感觉是可靠的，是全部知识的泉源。全部科学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是在于用理性的研究方法去整理感官所提供的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这种理性方法的主要形式。在物质的固有的特性中，运动是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这里所说的运动不仅是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主要是物质的动力、生命力、张力，或者用雅科布·伯麦的术语来说，物质的《Qual》[“痛苦”]

培根，弗兰西斯，维鲁拉姆男爵（1561—1626年），杰出的英国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的创始人；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编者注

霍布斯，托马斯（1588—1679年），著名的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具有鲜明的反民主的倾向。——编者注

洛克，约翰（1632—1704年），著名的英国二元论哲学家，感觉论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摇摆于货币名目论和货币金属论之间。——编者注

按照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的学说，同素体是可以无限分割的、具有质的规定性的极小的物质粒子。阿那克萨哥拉认为，同素体是万物的本源，它们的结合构成各种不同的物体。——编者注

《Qual》是哲学上的双关语。《Qual》按字面的意思是苦闷，是一种促使采取某种行动的痛苦；同时，神秘主义者伯麦把拉丁语 *qualitas*[质]的某些意义加进这个德国字；他的《Qual》和外来的痛苦相反，是能动的本原，这种本原从受《Qual》支配的事物、关系或个人的自发发展中产生出来，而反过来又推进这种发展。（恩格斯在英文版上加的注，在德文版上未加。——编者注）

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本身还包含着多方面发展的萌芽。一方面，被赏心悦目的、诗意的魅力环绕着的物质似乎以迷人的微笑吸引着人的整个身心。另一方面，以格言形式表述出来的学说却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

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以感觉为基础的知识，失去了它的诗的绚丽色彩，它变成了数学家的抽象的经验；几何学被宣布为科学的女王。唯物主义开始憎恨起人类来了。既然唯物主义要克服自己的对手，即憎恨人类的、不要肉体的唯灵论，并且是在后者自己的范围内予以克服，它就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而变成禁欲主义者，这样，它就从感性的东西变成理性的东西；可是，它因此也就发展着理性所特有的不顾后果的全部彻底性。

霍布斯，作为培根的继承者，这样推论道：如果人类的全部知识都是由感官提供的，那末我们的概念和观念就不过是现实世界的丧失了感性形式的幻影。哲学只能给这些幻影冠以名称。一个名称可以用于许多幻影。甚至还可以有名称的名称。但是，如果一方面认为一切观念都起源于感性世界，另一方面又说一个词的意义不止是一个词，除了通过我们的感官而为我们所知道的存在物，即全都是个别的存在物之外，还有某种普遍的，非个别的存在物，那就矛盾了。无形体的实体和无形体的形体一样，都是荒唐的。形体、存在、实体只是同一种实在的不同名称。不可能把思维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假如无限的这个词不表示我们的精神能够完成无限的相加过程，那末这个词就毫无意义。既然只有物质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可以觉察到的，那末关于上帝的存在，我们就丝毫不能有所知了。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确实可信的。人的一切情欲都是既有开始也有结束的机械运动。欲求的对象就是我们称为善的东西。人和自然都受同样的规律支配。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说系统化了，但是他没有论证培根关于人类的全部知识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则。洛克在他的《人类悟性论》中提供了这种论证。

霍布斯打破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的偏见；柯林斯、多德威尔、考尔德、哈特莱、普利斯特列同样地打破了还包围着洛克的感觉论的最后的哲学藩篱。无论如何，对实际的唯物主义者来说，自然神论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

关于现代唯物主义在英国的起源，卡尔·马克思就是这样写的。如果英国人现在对马克思给予他们祖先的赞扬并不感到十分高兴，那真是遗憾得很。可是不容否认，培根、霍布斯和洛克是法国唯物主义者这个光辉的学派的前辈。尽管十八世纪时法国人在陆上和海上的一切战争中都被德国人和英国人所战胜，法国唯物主义者还是使十八世纪成为主要是法国人的世纪，这

99900260_285_3 在德译文中，在“痛苦”一词后面，又从《神圣家族》中援引了英文版中删去的一句话：“物质的原始形式是物质内部所固有的、活生生的、本质的力量，这些力量使物质获得个性，并造成各种特殊的差异。”——编者注

在德译文中，这句话是：“它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经验”；在这句话之后又援引了英文版中删去的一句话：“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编者注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

甚至发生在卓绝的法国革命之前；而这次革命的成果，我们在英国和德国的局外人都还在试图移植于我们自己的环境。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4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2—385页

英国的政治活动、出版自由、海上霸权以及规模宏大的工业，几乎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充分发展了民族特性所固有的毅力、果敢的求实精神、还有冷静无比的理智，这样一来，大陆上的各个民族在这方面也远远地落在英国人后面了。……能够和英国文学媲美的恐怕只有古希腊文学和德国文学了；在哲学方面，英国至少能举出两位巨匠——培根和洛克，而在经验科学方面享有盛名的则不计其数。如果有人问，贡献最多的是哪一个民族，那谁也不会否认是英国。

恩格斯：《英国状况英国宪法》（1844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9页

霍布斯是第一个近代唯物主义者（十八世纪意义上的），但是当君主专制在整个欧洲处于全盛时代，并在英国开始和人民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洛克在宗教上就象在政治上一样，是1688年的阶级妥协的产儿。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

一般说来，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都把培根和霍布斯当作自己的哲学家，而后来洛克成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哲学家”。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28页注（111）

因为洛克是同封建社会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权观念的经典表达者；此外，洛克哲学成了以后整个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观念的基础，所以他的观点就更加重要。[XX—1293a]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写于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93页

除了否定神学和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之外，还需要有肯定的、反形而上学的体系。人们感到需要一部能够把当时的生活实践归结为一个体系并从理论上加以论证的书。这时，洛克关于人类理性的起源的著作很凑巧地在英吉利海峡那边出现了，它象一位久盼的客人一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2页

方括号中的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表示马克思手稿的稿本编号和页码。——编者注
指洛克《关于人类理性的经验》。——编者注

约翰·洛克是一切形式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代表工厂主反对工人阶级和贫民，代表商人反对旧式高利贷者，代表金融贵族反对作为债务人的国家，他在自己的一本著作中甚至证明资产阶级的理智是人类的正常理智，他也接受了朗兹的挑战。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年8月—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67—68页

论贝克莱

贝克莱主教是英国哲学中神秘唯心主义的代表，他给观念的货币计量单位学说加上了讲求实际的“财政部秘书长”所忽略的理论气质，这是合乎常理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年8月—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69页

他说，我完全不能理解，怎么能撇开人的感知来谈物的绝对存在呢？存在就是被感知（their，即物的 *esse is percipi*，第3节，——这是哲学史教科书中常常引用的贝克莱的一句名言）。“在人们中间奇怪地流行着这样一种见解：房屋、山岳、江河，一句话，一切感性实物都有一种自然的或真实的存在，这种存在不同于理性所感知的那种存在。”（第4节）贝克莱说，这个见解含有一个“明显的矛盾”。“因为，上面所说的那些对象若不是我们凭感官感知的物，那究竟是什么？我们所感知的若不是我们自己的观念或感觉（*ideas or sensations*），那又是什么呢？认为任何观念、感觉或它们的组合能够不被感知而存在着，这岂不是非常荒谬吗？”（第4节）

贝克莱现在把观念的集合换成了感觉的组合这个在他看来是含义相同的说法，责备唯物主义者“妄”想更进一步去找出这种复合……即这种感觉的某个泉源。在第五节里，他责备唯物主义者玩弄抽象，因为在贝克莱看来，把感觉和对象分开，这是空洞的抽象。……

……贝克莱在否定客体的“绝对”存在即物在人类认识之外的存在时，直截了当地说明他的敌人的观点是承认“自在之物”。在第二十四节里，贝克莱加上着重号写道，他所驳斥的那种看法承认“自在的感性客体（*objects in themselves*）或心外的感性客体的绝对存在”（前引书第167—168页）。在这里，哲学观点的两条基本路线被直率、清楚、明确地描绘出来了。这一点是古典哲学著作家不同于当代“新”体系的制造者的地方。唯物主义承认“自在客体”或心外客体，认为观念和感觉是这些客体的复写或反映。与此相反的学说（唯心主义）认为，客体不存在于“心外”；客体是“感觉的组合”。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19—20页

贝克莱不只是直言不讳地说出他的哲学倾向，他也竭力掩盖他的哲学的唯心主义真面目，把它说成没有荒谬见解的并为“常识”所能接受的。他本能地保护自己，使自己不被人责难为现在所谓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和唯我论者。他说，我们的哲学“没有使我们失去自然界中的任何一物”（第34节）。启然界依然存在着，实物和幻想的区别也依然存在着，不过“两者同样地都

贝克莱，乔治（1684—1753年），爱尔兰的克罗茵主教，英国唯灵论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的奠基人。

——编者注

指贝克莱。——编者注

存在于意识中”。“我决不对我们通过感觉或思考能够认识到的任何一物的存在提出异议。我用眼睛看到的和用手触到的那些物是存在的，是真实存在的，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我们否定其存在的唯一的物，是哲学家们<着重号是贝克莱加的>叫作物质或有形实体的东西。否定它，不会给其余的人类带来任何损害；我敢说，他们任何时候都不会觉察出缺少了它……无神论者的确需要这个徒有其名的幽灵来作为他们的不信神的根据……”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23页

论笛卡儿

“确切地和在散文的意义上说”，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儿，一派起源于洛克。后一派主要是法国有教养的分子，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前一派是机械唯物主义，它成为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的财产。这两个派别在发展过程中是相互交错的。我们没有必要来详细考察直接起源于笛卡儿的法国唯物主义，同样，我们也没有必要来详细考察法国的牛顿学派和法国一般自然科学的发展。

因此，我们只指出如下的几点：

笛卡儿在其物理学中认为物质具有独立的创造力，并把机械运动看做是物质生命的表现。他把他的物理学和他的形而上学完全分开。在他的物理学的范围内，物质是唯一的实体，是存在和认识的唯一根据。

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附和笛卡儿的物理学而同他的形而上学相对立。他的学生的职业是反形而上学者，即物理学家。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0页

论爱尔维修、拉美特利、霍尔巴赫

爱尔维修也是以洛克的学说为出发点的，他的唯物主义具有真正法国的性质，爱尔维修也随即把他的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爱尔维修《论人》）。感性的印象和自私的欲望、享乐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人类智力的天然平等、理性的进步和工业的进步的一致、人的天性的善良和教育的万能，这就是他的体系中的几个主要因素。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5—166页

拉美特利的著作是笛卡儿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的结合。拉美特利利用了笛卡儿的物理学，甚至利用了它的每一个细节。他的《人是机器》一书是模仿笛卡儿的动物是机器写成的。在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中，论述物理学的那一部分也是法国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的结合，而论述道德的部分实质上则是以爱尔维修的道德论为依据。还和形而上学保持着最密切联系并为此受到黑格尔赞许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罗比耐（《自然论》），和莱布尼茨的学说有非常明显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6页

政治经济学是这种功利论的真正科学；它在重农学派那里获得了自己的真正的内容，因为重农学派最先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个体系。我们看到，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已经把这种学说理想化了，这种做法是和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前的反封建的作用完全一致的。在霍尔巴赫那里，个人在相互交往中的一切活动，例如谈话、爱情等等都被描写成功利关系和利用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79页

由此可见，霍尔巴赫的理论是关于当时法国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有正当历史根据的哲学幻想，当时资产阶级的剥削欲望还可以被描写成个人在已经摆脱旧的封建羁绊的交往条件下获得充分发展的欲望。但是，在十八世纪，资产阶级所理解的解放，即竞争，就是给个人开辟比较自由的发展的新活动场所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在理论上宣布符合于这种资产阶级实践的意识、相互剥削的意识是一切个人之间普遍的相互关系，——这也是一个大胆的公开的进步，这是一种启蒙，它揭示了披在封建剥削上面的政治、宗法、宗教和闲逸的外衣的世俗意义，这些外衣符合于当时的剥削形式，而君主专制的理论

爱尔维修，克劳德·阿德里安（1715—1771年），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的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编者注

拉美特利，朱利安（1709—1751年），法国医生，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卓越代表人物。——编者注

霍尔巴赫，保尔·昂利（1723—1789年），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之一。——编者注

家们特别把它系统化了。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0页

在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面前，不仅已经出现了英国的理论以及荷兰和英国资产阶级的已有的发展，而且还出现了正为自己自由发展而斗争的法国资产阶级。作为整个十八世纪的特征的商业精神特别是在法国以投机的形式笼罩了一切阶级。当时政府的财政困难以及因此发生的关于课税的辩论遍及整个法国。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巴黎是十八世纪唯一的世界城市，是各国人物在此进行个人交往的唯一城市。所有这些前提，再加上法国人一般所具有的比较通达的特征，使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理论带有独特的无所不包的色彩，但同时使它失去了我们还可以在英国人那里找到的实证的经济内容。在英国人那里，理论是单纯地肯定事实，可是在法国人那里，却变成了哲学体系。我们从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那里看到的这种没有实证内容的一般观点，是同最初表现在边沁和穆勒学说里的充实的内容有本质区别的。前一种理论同正在进行斗争的而尚不发达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而后一种理论是同占统治地位的发达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2页